

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 蘇軾〈荔支歎〉的譏刺、典範與創意

劉昭明^{*}

〔摘要〕

蘇軾〈荔支歎〉是其惠州詩第一名篇，其作意來自於杜牧，然蘇軾借題發揮，引物連類，窮情盡變，由古轉今，由漢唐貢荔轉為本朝貢茶、貢花，巧妙地將譏刺對象由漢唐帝王權貴轉為本朝昏君佞臣，點名道姓，直斥其非，開門見山，毫無隱飾，獲得後人的一致推崇。蘇軾〈荔支歎〉的藝術技巧與思想意涵超越唐人，領先宋人，批判力更強，現實性更濃，同類詩作無出其右，堪稱是充滿創意的典範之作，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本文限於篇幅，僅就「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此一主題深入探討，先考論相關情事，以相關詩文、史事發明蘇軾詩心，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闡發幽微，彰顯〈荔支歎〉詩義，再歸納其典範與創意，希望能言之有物，持論有據，而非浮談無根，空說泛論，庶免皮相之譏。

關鍵詞：蘇軾、歐陽脩、丁謂、蔡襄、錢惟演、宋哲宗、荔枝、茶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

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十月二日，蘇軾抵達惠州貶所。惠州位處嶺南，氣候濕熱，盛產水果，其中尤以號稱嶺南珍果的荔枝最得蘇軾歡心，〈食荔支二首〉其二云：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1

蘇軾對惠州荔枝的喜愛溢於言表，惠州荔枝的鮮美滋味撫慰了蘇軾遠謫南荒的哀愁。在眾多的嶺南水果中，蘇軾詩中提及荔枝的次數最多，表現方式最富變化，或詠物，或譏刺，或反映民俗，是蘇軾惠州詩的一個重要主題。其中，尤以紹聖二年（1095）五、六月所作〈荔支歎〉更是箇中傑作：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阮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蘇軾自註：「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蘇軾自註：「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蘇軾自註：「今年閩

¹ 〈食荔支二首〉其二，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冊7，頁2094。本文所引用典籍，於各章各節首次出現時，詳細註明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註釋號碼，統一置於正文或引文標點符號之後。文中出現之人物，除帝王之外，一律連名帶姓，使用全稱。

中監司，乞進鬥茶，許之。」）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蘇軾自註：「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

2

唐人書寫荔枝的詩篇極多，最有名的是杜牧之〈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3

此詩譏刺唐玄宗與楊貴妃之窮奢極欲，蘇軾〈荔支歎〉的作意明顯來自於杜牧，然蘇軾借題發揮，引物連類，窮情盡變，由古轉今，由漢唐貢荔轉為本朝貢茶、貢花，巧妙地將譏刺對象由漢唐帝王權貴轉為本朝昏君佞臣，點名道姓，直斥其非，開門見山，毫無隱飾，獲得後人的一致推崇。蘇軾〈荔支歎〉的藝術技巧與思想意涵超越唐人，領先宋人，批判力更強，現實性更濃，同類詩作無出其右，堪稱是充滿創意的典範之作，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本文限於篇幅，僅就「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此一主題深入探討，先考論相關情事，以相關詩文、史事發明蘇軾詩心，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闡發幽微，彰顯〈荔支歎〉詩義，再歸納其典範與創意，希望能言之有物，持論有據，而非浮談無根，空說泛論，庶免皮相之譏。

二、譏刺丁謂是宋代貢茶買寵的始作俑者

蘇軾〈荔支歎〉先書寫漢唐貢荔的血淚史，深化對漢唐帝王權貴的譏刺，抒發對基層兵卒百姓的悲憫。在提出個人祝願之後，引物連類，由古入今，因漢唐貢荔之弊而及宋朝貢茶貢花之歎，由譏刺漢唐昏君權貴轉為譏刺當今聖上、本朝名宦，這是蘇軾的創意與巧思，也是〈荔支歎〉真正的詩旨。清·趙克宜《角山

² 〈荔支歎〉，見《蘇軾詩集》，冊7，頁2126-2128。

³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見唐·杜牧撰，清·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9月，初版），頁138。

樓蘇詩評註彙鈔》評說：「此主意也，卻似牽連及之，故妙。」⁴趙氏完全正確掌握蘇軾之生花妙筆與苦心孤詣，〈荔支歎〉前幅對漢唐史事的書寫只是一個引子，只是一種陪襯，下幅對當今聖上、本朝佞臣的譏刺才是最重要的詩旨，才是蘇軾作〈荔支歎〉的本心，才能體現蘇軾為民喉舌、不畏罪罟的膽識與勇氣。其中，精製、進貢建州大龍團給宋太宗的丁謂，便是蘇軾〈荔支歎〉第一位批判的宋代佞臣：

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

蘇軾自註：

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荔支歎〉自註多達四處，成為本詩一大特色，這是蘇軾刻意為之，其目的是為了彰明詩意，也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此處，上承漢唐貢荔之害，加上以註明詩，援引歐陽脩臧否之語，蘇軾譏刺丁謂、蔡襄先後進貢建州大龍團、小龍團諂媚買寵之意極顯明，〈荔支歎〉寫作的重點不是詠物，而是諷諭，「歎」字才是寫作的重心。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東坡引用史傳》載：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⁵

蘇軾〈荔支歎〉大量出註正同此意。〈荔支歎〉上幅既書寫漢唐貢荔之害，那麼下幅的寫作重點當然不會是建州團茶發展史，而是北宋佞臣建州貢茶史，蘇軾認

⁴ 見清·趙克宜撰，《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冊3，頁1481。

⁵ 見宋·洪邁撰，《容齋隨筆·容齋三筆·東坡引用史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卷11，頁7。

為這部血跡斑斑貢茶史的始創者者是丁謂，續成者是蔡襄，從此年年不斷，代代不絕，給建州人民帶來很大的負擔與禍害。蘇軾的〈荔支歎〉不僅是一首批判力十足的政治諷諭詩，也是一首充滿人民辛酸血淚的史詩。清·紀昀於此評說：

自此以下，百端交集，胸中鬱勃，有不可以已者。不可以已而言，斯為至言。⁶

這種評論，正確詮釋了蘇軾寫作〈荔支歎〉的激憤心情。蘇軾謫居惠州，聽聞宋哲宗同意福建轉運使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悲憤填膺，鬱悶壅塞，無法宣洩，於是寫作〈荔支歎〉，推本溯源，從建州貢茶的創始者丁謂、續成者蔡襄著手批判，由此生發開來。〈荔支歎〉的寫法輕史料，重批判，既呼應題面的「歎」字，也承續上幅譏刺漢唐貢荔之害，使前、後幅過渡得很自然，引物連類，因屋及烏，似斷未斷，血脈相連，精神相通，不會有離題之譏，這是蘇軾寫作〈荔支歎〉的典範與創意。

〈荔支歎〉此處所稱之「武夷溪」，是一種泛稱，事實上宋朝無此溪名，蘇軾用以指稱福建武夷山一帶，當地傳說古代有神明武夷君居此，故名。⁷宋代屬福建路建州建陽縣管轄，在縣北一百二十八里，位於福建、江西兩省之間，主脊線偏向福建省，平均海拔 1000~1500 公尺，最高峰黃崗山海拔 2157 公尺，九曲溪、黃柏溪環繞其中。⁸武夷山自古就是我國著名的產茶區，品質為福建之冠，《武夷山志·物產·茶》載：

茶之產不一，崇、建、延、泉隨地皆產，唯武夷為最。他產性寒，此獨性溫也。⁹

⁶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 年 6 月，未載版次），頁 752。

⁷ 參見宋·李昉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地部·武夷山》（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1 版 2 刷），冊 1，頁 428。

⁸ 參見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武夷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7 月，1 版 1 刷），冊中，頁 1683。

⁹ 清·董天工撰，《武夷山志·物產·茶》，見《中國茶典》編委會編，《中國茶典·茶史料》（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385。

宋茶以建茶品質最佳，建茶又以武夷山所產品質最優，故蘇軾〈荔支歎〉以「武夷溪邊粟粒芽」概稱建州團茶。

丁謂，初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宋真宗淳化三年（992）中進士甲科，歷仕饒州通判，福建路、陝西路轉運使，權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元年（1004），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二年（1005），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拜三司使。五年（1012），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九年（1016），知昇州。天禧三年（1019），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四年（1020），除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河南府。乾興元年（1022），封晉國公，人稱「丁晉公」。仁宗立，進司徒兼侍中，為山陵使，獲罪貶崖州司戶參軍。明道中，以秘書監致仕。景祐四年（1037）卒於光州，年七十二。¹⁰丁謂多才藝，富智謀，以奸邪著稱，時人將之與王欽若、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並列為「五鬼」。¹¹宋人多不齒丁謂，常加以譏評，如宋·李觀〈答李觀書〉云：

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為吾徒羞。¹²

「孫」指孫何，「丁」指丁謂，同受王禹偁賞識，文名大振，時人常並稱之。¹³李觀致書李觀，稱譽孫何、丁謂；李觀卻不恥兩人之政事、人品。宋·曾鞏《隆平集·丁謂傳》亦載：

¹⁰ 參見宋·王稱撰，《東都事略·丁謂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載版次），冊2，頁739-744。元·脫脫等撰，《宋史·丁謂傳·論贊》（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冊12，頁9566-9570。

¹¹ 參見《宋史·王欽若傳》，冊12，頁9564。

¹² 〈答李觀書〉，見宋·李觀撰，《李觀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10月，初版），頁321。本書校點者，誤以為「孫丁」為一人，當訂正。

¹³ 如宋·曾鞏《隆平集·王禹偁傳》載：「所與游必儒雅，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遂名重一時。」見清·乾隆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初版），頁127。

謂機敏有智謀，儉巧險詖亦罕其儔。文字經目，雖千百言無遺忘。¹⁴

曾鞏稱美丁謂的才智，卻譏詆其偏邪不正的惡行。丁謂是一代奸相，一生作惡無數，罄竹難書，堪稱是姦邪之雄，故蘇軾〈荔支歎〉之譏，與宋人評論相合，人無異詞。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丁謂任福建路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¹⁵《宋史·丁謂傳》載：

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逾年，值史館，以太子中允為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使。¹⁶

當時，丁謂對自己精製、進貢大龍團茶很得意，認為浙江湖州與湖北宜都所出產的名茶都該自慚形穢，作詩大肆張揚，唯恐天下不知。〈北苑焙新茶·并序：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為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

北苑有龍茶，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麟。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為靈藥助，用與上樽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卻

¹⁴ 《隆平集·丁謂傳》，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1，頁46。

¹⁵ 見《東都事略·丁謂傳》，冊2，頁739。《東都事略》謂丁謂於宋太宗淳化年間任福建路轉運使，所載有誤，今修訂之。參見李之亮撰，《宋代路分長官通考·福建路轉運使》（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6月，1版1刷），冊中，頁866。

¹⁶ 見《宋史·丁謂傳》，冊12，頁9566。

麝，淺色過於筠。顧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

17

詩題之「北苑」是地名，是建茶的最佳產地，其意同於蘇軾〈荔支歎〉之「武夷溪邊」，但宋人習稱為「北苑」。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載：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¹⁸

丁謂〈北苑焙新茶〉描繪建州大龍團之採製、進貢很詳細，在社日之前十五天就驅使數千個民工採摘嫩芽，日夜趕工，以便趕在社日之前入貢朝廷。建州緯度較低，氣候較其他名茶產區溫暖，當汴京猶是春寒料峭的天氣，建州早已完成大龍團之進貢作業。丁謂〈北苑焙新茶〉極言大龍團之精良，可供御用，可為地方之榮，十足佞臣聲口，蘇軾〈荔支歎〉卻祝願說：「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悲天憫人之情溢於言表，二詩對比強烈，佞臣的醜陋面目與仁者的偉大襟懷表露無遺。

當時，丁謂又作〈進新茶表〉云：

右件物，產異金沙，名非紫筍。江邊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闕下春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為貴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新茶，蓋遵舊例。¹⁹

丁謂認為自己精製之大龍團與湖州用金沙泉所精製之紫筍名茶不同，產期較早，數量更少，品質更精。當時丁謂精製大龍團，日役千夫，冒雨採摘嫩芽，日夜趕

¹⁷ 宋·丁謂〈北苑焙新茶〉，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1版1刷），頁1146。

¹⁸ 見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夢溪筆談·補筆談·辯證》（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4月，香港重印版），頁286。

¹⁹ 宋·丁謂〈進新茶表〉，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5（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10月，1版1刷），頁599-600。

工，進貢的團茶僅四十餅，一斤有八餅，故總共才五斤。物以稀為貴，故丁謂宣稱自己不敢私藏享用，只敢進貢宋太宗，〈進新茶表〉與〈北苑焙新茶〉一樣，十足佞臣聲口，不愧是一代奸佞。丁謂既想獻茶媚上，又怕惹人非議，故搬出「遵舊例」之說，為自己遮羞。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載：

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制，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於《茶錄》。

文下自註：

人多言，龍鳳團起於晉公，故張氏《畫墁錄》云：「晉公漕閩，始創為龍鳳團。」此說得於傳聞，非其實也。²⁰

今考丁謂於至道元年、二年(996)任福建路轉運使，趙賀於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任福建路轉運使，²¹故熊蕃所言未確，「咸平初丁晉公漕閩」，當作「至道初丁晉公漕閩」。早在唐代，福建就已進貢蠟面茶，《舊唐書·哀帝紀》載：

敕：「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此因闍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蓋，伏恐煩勞。今後只貢進蠟面茶。其進橄欖子宜停。」²²

唐哀帝體恤民力，下旨福建停止進貢橄欖，卻保留福建蠟面茶之進貢，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茶品》亦載：

《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奉敕宜依者，各令據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

²⁰ 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637。

²¹ 參見《宋代路分長官通考·福建路轉運使》，冊中，頁866。

²² 見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1版7刷），冊3，頁796。

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豆蔻一百枚、肉豆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有加焉。²³

建州貢茶，唐末時已有之，不過當時所貢是蠟面茶，而非大龍團。蠟面茶，省稱「蠟面」、「蠟茶」，因烹煮時湯面如乳，與融蠟相似，故名。²⁴宋初承之，亦貢蠟面茶，其後丁謂赴閩，監製大龍團，品質轉精，名揚天下。丁謂曾將自己製茶心得寫成《北苑茶錄》三卷，日後謫居海南島又作〈茶〉詩自我吹詡：「真上堪修貢，甘泉代飲醇。」「唐賢經譜內，未識建茶春。」²⁵再加上丁謂曾經拜相，本身就是知名人物，知名度遠勝過之前的福建路轉運使，故宋人常將丁謂與建州團茶畫上等號，視其為精製、進貢大龍團的第一人。這種觀念雖不合史實，卻是宋人的普遍看法，蘇軾〈荔支歎〉承此說，譏刺丁謂是進貢建州龍團的始作俑者。

丁謂在建州精製大龍團，其目的專為上供內廷，數量雖不多，但品質極精良，是當時最好的茶品，極為宋太宗所寶愛。宋·張舜民《畫墁錄》載：

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始為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貢，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²⁶

²³ 見宋·吳曾撰，《能改齋漫錄·茶品》（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初版），頁467。

²⁴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載：「建茶名蠟茶，為其乳泛湯面，與鎔蠟相似，故名蠟面茶也。楊文公《談苑》曰：『江左有蠟面之號』是也，今人多書『蠟』為『臘』，云取先春為義，失其本矣。」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冊852，頁243。

²⁵ 宋·丁謂〈茶〉，見《全宋詩》，冊2，頁1152。

²⁶ 宋·張舜民《畫墁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166。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亦載：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餅。²⁷

丁謂精製、進貢的建州團茶有龍團、鳳團兩種，「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²⁸自丁謂建州貢茶之後，成為常制，每年都須進貢大龍團至汴京帝廷。

丁謂初進大龍團僅五斤四十餅，已須驅使數千位民夫日夜趕工採摘精製，但求獻茶媚上，加官進祿，毫不顧惜民力。其後官吏媚上之心益熾，帝王口腹之欲益深，貪多務得，誅求無厭，建州貢茶品質越來越精，宋仁宗慶曆年間升級為小龍團，宋神宗元豐年間升級為密雲龍，至蘇軾作〈荔支歎〉時已升級為瑞雲龍，不但品質日益求精，進貢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當然民眾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北苑茶》載：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曆中，蔡端明為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於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銖。²⁹

曾敏行，字達臣，號浮雲居士、獨醒道人、歸愚老人，宋吉州吉水人，生於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卒於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據其載記，南宋初年建茶之入貢，分十二綱，多達四萬九千多銖，數量極龐大。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載：

²⁷ 見宋·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1刷，與宋·歐陽脩《歸田錄》合刊本），頁99。

²⁸ 宋·楊億〈建州蠟茶〉，參見宋·楊億口述，宋·黃鑑筆錄，宋·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1版1刷，與宋·張師正《倦遊雜錄》合刊本），頁142。

²⁹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北苑茶》，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冊3，頁3280。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又有石門、汝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迄事。³⁰

清·蘭陳《武夷紀要·茶》載：

宋無時有北苑龍團之貢，遂編徭役，名曰茶戶。每歲差官督制，民疾奔命，苦不可言，至明朝罷之。³¹

一天要役使千名民夫，時間長達兩個月，每年要花費二萬餘緡，佞臣進貢建茶可以博得聖眷，卻勞民傷財，為建州人民增加負擔，招來禍害，推本究源，丁謂是始作俑者，蘇軾〈荔支歎〉之譏刺合情合理。此外，自丁謂貢茶之後，不肖官員有樣學樣，打著仿效建州團茶入貢的理由，將本地名茶進貢內廷，伺機謀利，作奸犯科。宋·沈括《夢溪筆談·浙茶入貢》載：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茶餅，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為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³²

³⁰ 見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周本淳重訂，《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1月，1版2刷），頁85-86。

³¹ 清·蘭陳《武夷紀要·茶》，見《中國茶典·茶史料》，冊上，頁371。

³² 見《新校夢溪筆談·謬誤》，頁224。

丁謂於宋太宗至道元年貢茶，流風所及，到了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章獻太后垂簾聽政，李溥托言仿效建茶入貢之例，趁入朝呈奏計簿之便，以賦稅盈餘搜購浙茶，從中牟利，中飽私囊。丁謂、李溥之進貢建茶、浙茶，前後相距僅二十八年，官風日下，士風日壞，遭受苦難、增加負擔的百姓日多，推源究始，丁謂難辭其咎，故蘇軾作〈荔支歎〉加以譏刺。丁謂素以奸佞媚上著稱，曾因阿諛宋真宗封禪、建宮，得以真除三司使。《宋史·丁謂傳》載：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敢復言。迺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謂機敏有智謀，儉狡過人。……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³³

丁謂認為宋真宗富有天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全天下的財富都歸宋真宗所有，封禪、建宮可祭拜天地，事奉天神，為宋真宗求福求子，雖勞民傷財、耗損國力有何不可？大臣憑什麼反對？丁謂之諂佞奸邪堪稱宋真宗朝第一人！對丁謂來說，精製、進貢大龍團取媚宋太宗，只是升官發財的一種手段，無足為奇；但看在蘇軾的眼裡卻難以忍受，故作〈荔支歎〉加以譏刺，這一切都出自於正直公義、仁民愛物之心，與丁謂之厚顏寡恥、名權利鎖恰好成為強烈的對比。蘇軾對丁謂

³³ 參見《宋史·丁謂傳》，冊12，頁9567-9568、9578。

的譏刺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人無異言。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建安錄三卷》亦認同蘇軾對丁謂的譏刺：

皇朝丁謂撰。建州研膏茶起於南唐，太平興國中始進御。謂咸平中為閩漕，監督州吏，創造規模，精緻嚴謹，錄其園焙之數，圖繪器具及敘采製入貢法式。盧仝譏陽羨貢茶有「安知百萬億蒼生，墜在顛崖受辛苦」之句，余於謂亦云。³⁴

晁氏推源究始，把宋代建州貢茶帶給千萬百姓的苦難，全部歸罪給丁謂，視他為千古罪人，這雖是一個很沉重的指控，卻深得蘇軾〈荔支歎〉的詩旨。北宋士人諂媚成風，不以為恥，蘇軾對此種惡劣風俗極痛心，思有以變之。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九日，學士院策館職，蘇軾發策命題，作〈試館職策問三首〉，第二首是〈兩漢之政治〉。³⁵日後作〈西漢風俗諂媚〉闡釋命題本意：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³⁶

蘇軾認為西漢之所以滅亡，在於諂媚成風，而「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丁謂精製、進貢大龍團取媚宋太宗正是北宋士風敗壞的開始，流風所及，雖元祐之治亦難去除，蘇軾〈荔支歎〉譏刺北宋佞臣首推丁謂其來有自。

³⁴ 見宋·晁公武撰，清·王先謙校，《郡齋讀書志》（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4月，再版），冊2，頁751。

³⁵ 〈試館職策問三首·兩漢之政治〉，參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2刷），冊1，頁211。

³⁶ 〈西漢風俗諂媚〉，見《蘇軾文集》，冊5，頁2009。

由以上論述可知，宋人對丁謂精製、進貢大龍團有許多載記，但都是稱美其品質之精良，數量之珍稀，為帝王權貴所珍愛；宋人對丁謂人品性行普遍無好感，對其貢茶取媚卻無惡評。點名道姓，寫詩譏刺丁謂貢茶買寵，貽害百姓，蘇軾是宋代第一人，這是〈荔支歎〉的創意。蘇軾〈荔支歎〉感歎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如果說丁謂之奸佞近於李林甫，那麼蘇軾的性行就近於唐羌了，他以唐羌為典範，譴責奸佞，為民喉舌，道出基層百姓的心聲，為苦難百姓抱不平。〈荔支歎〉的題面是悲歎荔枝帶給人民的禍害，但蘇軾引物連類，由古轉今，詩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明快地将漢唐貢荔轉為本朝貢茶，巧妙地將譏刺的對象由唐朝奸佞李林甫轉為本朝奸佞丁謂，批判他是建州貢茶買寵的始作俑者，以註明詩，彰顯譏刺之意，開門見山，直斥其非，毫無隱飾。〈荔支歎〉的寫作手法與思想高度超越唐人，領先宋人，批判性更強，現實性更濃，在同類詩篇中無出其右者，這是蘇軾〈荔支歎〉的典範與創意。

三、譏刺蔡襄踵步丁謂進貢小龍團

蘇軾〈荔支歎〉先譏刺丁謂創製、進貢大龍團阿諛宋太宗，順勢譏刺蔡襄擴大、成就丁謂之陋行，精製、進貢品質更精良之小龍團給宋仁宗，詩云：

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

蘇軾自註：

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繼丁謂之後，宋代名臣蔡襄是〈荔支歎〉譏刺的第二位佞臣，是助長丁謂貢茶惡行的幫凶，「爭新買寵各出意」，前仆後繼，爭相精製、進貢更新更好的團茶博取帝王的歡心，其罪行與丁謂同，故蘇軾將兩人並列，稱之為「前丁後蔡」，語

氣輕蔑，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對丁謂來說，這是罪有應得，人無異辭；對蔡襄來說，白璧微瑕，宋人所見略有不同，或加以譴責，或為之辯說。蘇軾〈荔支歎〉對蔡襄的譏評，與丁謂不大同，前有所承，後有迴響，盪起不少漣漪，更值得深入探討。

蔡襄，字君謨，福建興化仙遊人。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任漳州軍事判官。景祐元年（1034）七月，任西京留守推官，後改任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1043）四月，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後改任福建路轉運使。皇祐三年（1051），任右正言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次年（1052），任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吏部流內詮。至和元年（1054）七月，以禮部郎中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二年（1055），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知泉州軍州事。徙知福州。嘉祐三年（1058）七月，復知泉州。五年（1060），任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以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四年（1067）八月，病卒於故鄉，贈禮部侍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賜諡「忠惠」。³⁷蘇軾〈荔支歎〉所譏刺蔡襄貢茶一事，發生於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當時蔡襄任福建路轉運使，改進建州團茶的採製技術，精製、進貢品質更優良的小龍團，〈北苑十詠·造茶〉云：

屑玉寸蔭間，搏金新範裡。（蔡襄自註：龍鳳茶八片為一斤，上品龍茶每斤二十八片。）規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焙出香色全，爭誇火候是。³⁸

丁謂精製的建州團茶一斤八餅，宋人稱為大龍團；蔡襄精製的建州團茶一斤二十八餅，體積相對較小，宋人稱為小龍團。蔡襄於題下自註云：「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極精好，被旨號為上品龍茶，仍歲貢之。」蔡襄對自己的心血結晶很滿意，認為火候恰到好處，色香味俱全。蔡襄的苦心沒有白費，他精製、上貢的小龍團受到宋仁宗的賞愛，賜名為「上品龍茶」，按時歲貢，是當時品質最精良的茶品。

³⁷ 蔡襄仕歷，參見宋·蔡襄撰，陳慶元、歐明俊、陳貽庭校注，《蔡襄全集·前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1版1刷），頁1。

³⁸ 〈北苑十詠·造茶〉，見《蔡襄全集》，頁53-54。

以歐陽脩為例，他雖不認同蔡襄之貢茶，卻不得不讚賞小龍團之精良珍稀，〈歸田錄〉載：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鏤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³⁹

宋仁宗極珍愛小龍團，只有在重要節日才會合賜東府中書省、西府樞密院最高官吏八人共一餅，大家都視若珍寶，偶而出示親朋好友共同賞玩，卻捨不得煎煮享用。蔡襄小龍團身價不凡，由此可見。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亦載：

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奇玩，不敢自試，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⁴⁰

宋·張舜民《畫墁錄》亦載：

天聖中，又為小團，其餅迴加于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鏤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剗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並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麟為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儔敢與北

³⁹ 〈歸田錄〉，見宋·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3月，1版1刷），冊5，頁1931。

⁴⁰ 見《澠水燕談錄》，頁99。

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⁴¹

宋神宗熙寧年間，蘇頌出使遼國，極珍視小龍團，認為此物專供宋代帝王享用，遼國君王不配享用。可是演變到後來，建州小龍團竟成為北宋近貢遼國的必要物品。自蔡襄精製小龍團之後，大龍團身價暴跌，連遼國君王也知珍愛小龍團。諷刺的是，宋代帝王要建州進貢團茶給自己享用，北方強虜卻要宋代帝王進貢團茶來換取和平，不過受苦受難的還是最基層的建州百姓。

蔡襄〈北苑十詠·修貢亭〉又云：

清晨掛朝衣，盥手署新銘。騰虬守新鑰，疾騎穿雲嶺。修貢貴謹嚴，作詩諭遠永。⁴²

蔡襄此詩描寫自己籌畫小龍團進貢宋仁宗的情景，題下自註云：「予自采掇時入山，至貢畢。」刻意強調自己製茶進貢的辛勞，有邀功之嫌。因為小龍團極珍貴，運送過程不容許有任何差池，所以蔡襄特地打造飛龍形狀的鑰匙牢牢鎖緊貯裝小龍團的箱籠。蔡襄對自己謹慎恭敬、鄭重其事的态度很自豪，特別形於詩篇，希望能垂教後人，可是蘇軾卻不喜歡他這種一味討好帝王的臣妾性行。蔡襄之「騰虬守新鑰」，正是蘇軾〈荔支歎〉「前丁後蔡相籠加」的最佳註腳。同樣是書寫密封貢茶，蔡襄敬慎從事，自以為是敬君，是盡忠職守，事君為大，故以此為榮；蘇軾卻認為這是宮妾事君之行，非有風骨之讀書人所當為，故加以譏刺。同一種情事，在蘇軾與蔡襄的詩句裡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意涵與價值觀。以古人的眼光或許不該苛責盡忠職守的蔡襄，可是若以現代民主的觀念來觀察，蘇軾的思想高度實勝過蔡襄。宋人品茶，以新鮮為貴，⁴³正因為如此，蔡襄迫不及待要把自己

⁴¹ 宋·張舜民《畫墁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166-167。

⁴² 〈北苑十詠·修貢亭〉，見《蔡襄全集》，頁53-54。

⁴³ 宋·曾慥《高齋漫錄》載：「司馬光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精製的小龍團進獻給宋仁宗享用。福建路建州距開封三千五百里，⁴⁴路途迂迴遙遠，蔡襄派人快馬加鞭、千里飛馳、穿山越嶺，「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⁴⁵蔡襄詩所自負之「疾騎穿雲嶺」，正是蘇軾〈荔支歎〉所描繪之「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阮仆谷相枕藉」、「飛車跨山鶻橫海」，以蘇軾的眼光來看，蔡襄這種不恤民力、只求諂事帝王的行為，與漢唐貢荔之害沒有差別，蔡襄「騰虬守新鑰，疾騎穿雲嶺」所流露的恭謹，是宮妾之道，非忠臣之行。蘇軾以漢唐貢荔之惡帶出對本朝貢茶的悲歎，以註明詩，譴責蔡襄擴大、續成丁謂之惡，批判色彩很鮮明，譴責力度很強勁，字字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與仁民愛物的思想，好像一位正義凜然、恫瘝在抱的大丈夫傲岸於天地，以不屑的眼神怒視蔡襄，為苦難無助的建州百姓流下傷悲的眼淚。蘇軾〈荔支歎〉高超的詩藝、感人的情思，相對於蔡襄〈北苑十詠〉之平凡無奇、毫無思想高度可言，是一種典範與創新，值得我們喝彩。

慶曆八年（1048），蔡襄丁父憂，去職守喪，服除，召回朝廷，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這段期間，蔡襄在朝廷任職，宋仁宗曾面誇小龍團之精美，又常向他詢問試茶之道。蔡襄於皇祐三年作〈茶錄·序〉回憶說：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⁴⁶

蔡襄對自己以茶見知於宋仁宗，引以為榮，又作〈茶錄〉二篇上呈宋仁宗，博取聖眷。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五月二十六日，蔡襄任三司使、給事中，又作〈茶錄·後序〉回憶說：

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頁 317。

⁴⁴ 見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福建路·建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12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401。

⁴⁵ 〈嘗新茶呈聖俞〉，參見《歐陽脩全集》，冊 1，頁 114。品賞「建州新茶」，是宋代汴京士大夫的風流雅韻、喜悅樂事。嘉祐三年，建州太守徐仲謀饋贈「北苑新茶」給歐陽脩，歐陽脩賞味之餘，作此詩。

⁴⁶ 〈茶錄〉，見《蔡襄全集》，頁 671-672。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掌書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⁴⁷

事實上，宋仁宗確實對蔡襄眷顧有加，《宋史·蔡襄傳》載：

帝遇之甚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

48

其後，宋仁宗更讓蔡襄低階高用，權知三司使，掌控全國稅賦，號稱「計相」，⁴⁹位階在翰林學士之上，僅次於執政，由此可升為執政，位高權重。蔡襄之所以獲此榮寵，除了本身的性行、政事獲得帝王的肯定之外，精製小龍團博取聖歡、以茶事見知於宋仁宗想必有一定的作用。

蔡襄正直敢言，頗有官聲，其形象與丁謂完全不同，《宋史》論贊譽為「賢御史」、「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精於民事，吏不敢欺。」⁵⁰蔡襄數度官閩，政績卓著，官聲極佳，宋·王稱《東都事略·蔡襄傳》載：

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

⁴⁷ 〈茶錄·後序〉，見《蔡襄全集》，頁675。

⁴⁸ 見《宋史·蔡襄傳》，冊13，頁10400。

⁴⁹ 《宋史·職官志二·三司史》載：「三司使之職，國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冊5，頁3807。

⁵⁰ 見《宋史·蔡襄傳·論贊》，冊13，頁10415。

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遵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學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奢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⁵¹

《宋史·蔡襄傳》亦載：

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立德。⁵²

蔡襄為閩人興利除害，禮賢下士，提振學風，改良風俗，甚獲百姓敬愛。正因為如此，蘇軾〈荔支歎〉譏刺蔡襄貢茶取媚，將之與丁謂並列，不久就有異說。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載：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團，歲貢一斤。歐陽文中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⁵³

王鞏《甲申雜記》作於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此書既名「補遺」，寫作時間當略晚於此時，離蘇軾〈荔支歎〉之作約九年。王鞏年輩晚於蘇軾，兩人關係親密，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烏臺詩案定讞，王鞏受蘇軾連累，獲罪獨大，遠謫賓州。宋·秦觀〈王定國注論語序〉載：

⁵¹ 見《東都事略·蔡襄傳》，冊3，頁1144-1145。

⁵² 見《宋史·蔡襄傳》，冊13，頁10400。

⁵³ 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221-222。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賓州鹽稅。⁵⁴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麟》載：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⁵⁵

蘇軾與王鞏無論遠謫在外或入朝為官始終文字往來不斷，感情極佳，蘇軾極照顧王鞏，元祐元年九月曾舉薦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政敵卻藉攻擊王鞏來打擊蘇軾，其事遂不成。其後，蘇軾作〈辨舉王鞏劄子〉，力言王鞏之賢，並云：「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⁵⁶雖然王鞏與蘇軾極親近，但他卻不同意蘇軾〈荔支歎〉對蔡襄貢茶邀寵的譏評，他認為蔡襄之所以貢茶給宋仁宗，是為了撫慰宋仁宗沒有子嗣、未立太子的傷悲，這種說法很有創意，卻毫無說服力。蔡襄與王鞏的父親王素交好，曾自福建饋贈故鄉美味土產鹽漬鯔魚給王素，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載：

⁵⁴ 宋·秦觀〈王定國注論語序〉，見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1刷），冊中，頁1272-1273。

⁵⁵ 見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麟》（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22。清·紀昀等所撰《四庫全書·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題要》載：「王鞏，字定國，莘縣人，同平章事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後官至宗正丞，所記三卷，皆紀東都舊聞。」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179。其中，「謫監筠州鹽稅」未確！當作「謫監賓州鹽稅」。當時，獲罪謫「監筠州鹽酒稅務」的是蘇轍，不是王鞏。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紀事：「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稅務，正字王鞏謫監賓州鹽酒稅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2版1刷），冊12，頁7333。

⁵⁶ 〈辨舉王鞏劄子〉，參見《蘇軾文集》，冊3，頁831。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為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六尾云，所與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至京師，遺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⁵⁷

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何況鯔魚味美多卵，是蔡襄故鄉的著名特產，⁵⁸王鞏與蔡襄的交情由此可見；正因為如此，王鞏刻意幫世伯蔡襄開脫。雖然王鞏用心良苦，好不容易編造出一個具有創意的有趣理由，但一點也沒有說服力，無法推翻蘇軾〈荔支歎〉譏刺蔡襄貢茶取寵之說。不過，有一點倒是很重要，王鞏此文是對蘇軾〈荔支歎〉的回應，是蘇軾〈荔支歎〉接受史的第一章，彌足珍貴。

相對於王鞏刻意為蔡襄開脫，大作違心之論，宋·羅大經的態度較持平，《鶴林玉露·建茶》論說：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本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⁵⁹

羅大經此文既是針對蘇軾〈荔支歎〉評蔡襄而發，故「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一句，當作「其與進荔枝、牡丹者不同」。羅大經認為喝茶有益身心，能讓思緒清明，對治學、勤政或有助益，貢茶的層級較貢荔、貢花略高，然若用孟子的高

⁵⁷ 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頁 22。

⁵⁸ 子魚是鯔魚的別名，宋人亟稱之，認為是南方最美味的魚鮮，如宋·王得臣撰，俞宗憲校點，《塵史·詩話》：「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 2，頁 1348。宋·梅堯臣〈和答韓子華餉子魚〉亦云：「南方海物難具名，子魚珍美無與并。」見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 4 月，初版），冊下，頁 429。

⁵⁹ 見《鶴林玉露·建茶》，頁 51。

道德標準來檢驗，用同類事物比照類推，把義理引申到最極點，蔡襄之貢茶與佞臣之貢荔、貢花同屬獻物邀寵，兩者皆有違義理，所以遭到蘇軾的譏刺，淪落至與奸佞丁謂並稱。因此一個人必須謹慎將事，注意小節，否則稍有差池，大醇小疵，百口莫辯，遺憾終身，悔之晚矣，蔡襄貢茶就是最好的事例。羅大經此說極公允，既肯定蔡襄之人品道德，又不諱言其貢茶之非，不為其瑕疵開脫，與王鞏私心之論不同，頗能掌握蘇軾詩心。蘇軾一生敬重蔡襄，對其書藝尤其推崇，〈荔支歎〉的譏評只是「充類至義」之言，是《春秋》責備賢人之義，不必過份放大其事，不必過份苛責蔡襄，否則將不得蘇軾本心。

丁謂進貢大龍團，奸佞之人做諂佞之事，理所當然，不足為奇，故世人不以為訝；然蔡襄以正直之人，做諂佞之事，當然會令人側目，故歐陽脩為之驚詫，為之不值。蘇軾〈荔支歎〉將蔡襄與丁謂並列，於自註中引用歐陽脩評蔡襄貢茶非「士人」所當為。丁謂，進士甲科出身，多才藝，善詩文，無可懷疑，絕對是一「士人」，可是其性行偏邪不正，一生惡行無數，深為宋人所不恥，早就不把他當作是讀書人、知識份子。蔡襄不然，他能詩善文，書藝獨步當代，無論是性行或仕宦都有美聲，為人所稱道，堪稱是一位典型的讀書人、知識份子，與丁謂的形象截然不同。以蔡襄之正直賢良，理當為父母之邦之百姓父老興利除弊，停止丁謂開創之建州貢茶，端正士風；沒想到他因循舊例，甚至變本加厲，「爭新買寵」，進一步精製、進獻品質更佳之小龍團博取聖歡，為自己的宦途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因此難逃歐陽脩與蘇軾的譏評。由於蔡襄正直賢良的形象深植人心，又是蘇軾的長輩，若無明確的論述，妄加譏評必惹來非議，也無法說服人心，杜絕悠悠之口。蘇軾對此情境早有先見之明，特地以註明詩，搬出座師歐陽脩四十八年前的評論來強化、證成自己對蔡襄的譏刺，一陰一陽、一生一死，師生聯手跨越時空的界限，共同批判蔡襄進貢小龍團之不當，提高讀者的接受度。蘇軾〈荔支歎〉對蔡襄貢茶的譏刺雖前有所承，但他以註明詩，以師說證成己說，強化論述，補強詩意，達到自己譏刺蔡襄的目的，此種藝術構思頗有創意。蔡襄地下有靈，恐亦難以自辯。

有趣的是，蘇軾這種創意與巧思，說好聽是承續師論，發揚師說，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但如果說難聽一點，似有利用師長、借刀殺人之嫌，歐陽脩地下有知，恐未必認同蘇軾此種寫作手法。當年，歐陽脩對蔡襄進貢小龍團雖

有所臧否，但這只是求全之言，是一時激憤之語，不影響彼此之交情，兩人仍然詩文往來不絕，互動極佳。歐陽脩深知蔡襄嗜茶，曾將自己得來不易的小龍團贈送蔡襄，感謝他為自己書寫〈集古錄目錄〉刻石，這項厚禮當然讓蔡襄樂開懷，認為真是一種清雅不俗的禮物。歐陽脩〈歸田錄〉載：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錄〉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⁶⁰

尤有甚者，蔡襄「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⁶¹蔡襄曾將自己主持建州貢茶的經驗和心得撰成〈龍茶錄〉，省稱為〈茶錄〉，歐陽脩於宋英宗治平元年七月為作〈龍茶錄後序〉：

茶之為物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敘錄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但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預添，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才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62

文中，歐陽脩對小龍團之珍貴頗多著墨，並稱美蔡襄創製小龍團的貢獻，可見對昔日臧否之詞早已淡忘，不縈於懷。沒想到事隔多年，蘇軾作〈荔支歎〉翻舊帳，以註明詩，以歐陽脩評論蔡襄之言強化、證成自己譏刺蔡襄之論，假借歐陽脩之手鞭笞蔡襄，將蔡襄不光彩的陳年往事形於詩篇，廣為世人所知，蘇軾這種創意

⁶⁰ 〈歸田錄〉，見《歐陽脩全集》，冊5，頁1934。

⁶¹ 見《東都事略·蔡襄傳》，冊3，頁1147。

⁶² 〈龍茶錄後序〉，見《歐陽脩全集》，冊3，頁955。

與巧思，恐非歐陽脩當年評論蔡襄的本意。歐陽脩在九泉之下，恐遭老友蔡襄埋怨，直歎學生才情過高，太有創意，筆舌太犀利，有時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宋仁宗至和元年，御筆親書「君謨」二字遣使賜蔡襄，蔡襄作〈御筆賜字詩·并表〉，⁶³敘述自己蒙受宋仁宗御筆賜字的榮寵，滿紙歌功頌德、感恩圖報之言，雖無藝術價值可言，卻可窺見當年君蔡襄聖眷高隆、君臣相得的美事。值得注意的是，明·胡儼跋云：

余嘗在秘府讀君謨文集，閱其所上謝賜御書，歎其君臣相遇之盛也。及觀所書〈荔枝譜〉，字畫精妙，每與同列難其博物之精，而又惜其與「武夷粟粒」同一用心之勤耳。雖然，君謨當自珍愛其書，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觀此書，其言當不虛也。識者解之。⁶⁴

胡儼，江西南昌人，字若思，號頤庵。於天文、地理、律歷、醫卜無不究覽，兼工書畫。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以舉人官華亭教諭。永樂初薦入翰林，任檢討，累官國子監祭酒。朝廷大著作皆出其手，任《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總裁官。仁宗時進太子賓客兼祭酒，著有《頤庵文選》。胡儼稱美宋仁宗與蔡襄君臣之情，推崇蔡襄之書藝與博物，卻不滿蔡襄獻茶邀寵的性行。蔡襄撰〈茶錄〉，於〈後序〉中明言是「上進」宋仁宗之作，然〈荔枝譜〉並無類似載記，未必是「上進」宋仁宗之作。可是，胡儼受到蘇軾〈荔支歎〉「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的影響，遽認為蔡襄〈荔枝譜〉之寫作，同精製進獻小龍團一樣，都是出自希恩邀寵之心。胡儼所稱：「惜其與『武夷粟粒』同一用心之勤耳。」雖未必是事實，對蔡襄也不盡公平，卻可看出蘇軾〈荔支歎〉對後世的深遠影響，胡儼因此減低對蔡襄的評價。大陸學者吳以寧點校《蔡

⁶³ 〈御筆賜字詩·并表〉，參見《蔡襄全集》，頁66。

⁶⁴ 明·汪珂玉撰，《珊瑚網·蔡忠惠公進謝御賜詩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34。明·胡儼著有《頤庵文選》，參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2月，初版），頁545-680。

襄集》，撰著〈北宋名儒賢臣——蔡襄〉，也認為是因蘇軾〈荔支歎〉的譏刺，導致蔡襄形象受損，連帶使他的文章長期被掩沒，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蔡襄才德俊偉光明，堪傳華夷。然而，遺憾的是晚出二十五年的大文學家、書畫家蘇軾卻在其〈荔支歎〉一詩中不公正地譏諷了蔡襄有失名士風度，以貢小龍團「爭新買寵」於皇上。此論對蔡襄光明正大的形象不無損害，也許這也是蔡襄俊偉的「風節」和粹美的「文章」長期被掩的原因之一。

65

蘇軾〈荔支歎〉影響千年，甚至可改變世人對蔡襄風節、文章的觀感、評價與研讀的興趣，就影響力與寫作效益來說，〈荔支歎〉堪稱是詩中典範。

四、譏刺宋哲宗驕奢養欲

在「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之後，蘇軾〈荔支歎〉詩筆一轉，由譏刺丁謂、蔡襄爭貢新茶諂媚買寵之陳年往事，進一步譏刺時政，指斥當朝昏君、佞臣，寫作時空由宋仁宗慶曆七年直接跳到宋哲宗紹聖二年。在這四十年當中，建州團茶的製造技術連續兩次突破，先製造出品質勝過小龍團的密雲龍，再製造出品質勝過密雲龍的瑞雲龍。最讓有識之士欣慰的是，高太后先廢止建州小龍團、密雲龍之採製進貢，再拒絕福建轉運使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之請。不過，此項善政不久就毀於宋哲宗之手，貪圖物質享受的他，在親政之後，重開惡例，接受福建轉運使的佞言，讓建州進貢鬥茶瑞雲龍。蘇軾謫居惠州，聽到這項消息，悲憤填膺，滿腔怒火驅使他寫作〈荔支歎〉宣洩不滿，批判時政。於是，蘇軾〈荔支歎〉在譏刺貢茶買寵的佞臣之後，詩旨終於進入最高潮，轉為批判沉迷物欲的昏君，直斥當今聖上宋哲宗驕奢縱欲，貪圖享受，只知養欲，不知養德，不知養牧兆民，不知養護社稷，位高志下，不似人君，讓人鄙視：

⁶⁵ 見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附錄三·北宋名儒賢臣——蔡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頁969。

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蘇軾自註：「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鬥茶，許之。」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

自丁謂向宋太宗進貢建州大龍團之後，已成宋代常例，與帝王是否英明、昏庸無關。如蘇軾譏刺蔡襄貢茶邀寵，卻極推崇宋仁宗儉樸愛民之仁德仁政，〈書濟眾方後〉云：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康惇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⁶⁶

蘇軾對宋仁宗的推崇可說情溢乎辭，可見宋代帝王接受貢茶，並不影響他的評價。因此，蘇軾〈荔支歎〉譏刺貢茶買寵之丁謂、蔡襄，對受茶之宋太宗、宋仁宗並無譏評，唯獨對宋哲宗不留情面，疾言厲色，嚴予斥責。蘇軾謫居惠州，政治環境極險惡，可是他卻不顧禍福，以極端尖銳之語，譏刺時事，直斥乘輿，怒責宋哲宗驕奢鄙陋，讓人為他捏一把冷汗。蘇軾之所以如此犯忌干諱，有其特殊時空背景，只有先了解這種特殊情境，才能正確領會蘇軾的詩心，深入發明〈荔支歎〉的詩義。

丁謂於宋太宗時進大龍團，蔡襄於宋仁宗時貢小龍團，宋神宗時期，福建路轉運使持續進貢建州團茶，官府於北苑設「茶焙」一處，每年須進貢「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⁶⁷《宋史·地理志·福建路·建寧府》亦明載：「元豐貢龍鳳等茶。」⁶⁸就在此時，福建轉運使賈青突破了蔡襄小龍團的製造技術，進貢品質更精良的密雲龍。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密雲龍》載：

⁶⁶ 〈書濟眾方後〉，見《蘇軾文集》，冊5，頁2066。

⁶⁷ 見《元豐九域志·福建路·建州》，冊上，頁401。

⁶⁸ 見《宋史·地理志·福建路·建寧府》，冊3，頁2208。

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⁶⁹

今考賈青於元豐二年至元祐元年任福建路轉運使，⁷⁰故文中所言「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當作「元豐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葉夢得誤記，宋·周輝《清波雜志》從誤。⁷¹如元祐二年（1087），黃庭堅作〈博士王揚休輒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云：

喬雲蒼壁小龍盤，貢包新樣出元豐。⁷²

上句寫密雲龍外觀形貌，下句說明密雲龍新出於元豐年間，可證葉夢得之誤。賈青任福建路轉運使長達七年，官屢遷而職未變，直至宋神宗駕崩為止，北宋從無此例，這是宋神宗刻意倚重賈青精製、進貢「密雲龍」。自「密雲龍」一出，大龍團、小龍團都相形見绌。密雲龍以黃袋貯存，專供帝王享用；大龍團、小龍團用紅袋貯存，供帝王賞賜王公近臣，兩者身價差異極大。黃庭堅〈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又云：

小壁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⁷³

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亦載：

⁶⁹ 見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密雲龍》（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54。

⁷⁰ 參見《宋代路分長官通考·福建路轉運使》，冊中，頁875-876。

⁷¹ 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密雲龍》載：「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一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為賜。「密雲龍」獨用黃云。』」（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9月，1版1刷），頁154。

⁷² 〈博士王揚休輒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見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1版1刷），冊1，頁100。

⁷³ 〈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見《黃庭堅全集》，冊2，頁1013。

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時，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⁷⁴

密雲龍揀摘早春細嫩茶芽精製，不添加香料，外形較小龍團小，但較厚實，其上貼有龍翔密雲的金帛，故稱密雲龍，極獲宋神宗珍愛，捨不得多賞賜大臣。無數建州人民流血流汗的成果，只供內廷一人享受，宋神宗號稱一代英主，也迷醉於建州密雲龍的甘香，難免有損聖德，然密雲龍之珍稀亦由此可見。

宋哲宗幼年嗣位，高太后垂簾聽政，不重物質享受，不獨享稀世珍品，密雲龍漸由內廷賜給外臣，蘇軾曾於元祐四年（1089）獲賜密雲龍。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

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⁷⁵

蘇軾大節立朝，讜言正論，見不平事不吐不快，因此不見容於政敵，自請外放守杭。高太后素來賞識蘇軾，特地比照宰執恩例，於蘇軾出郊離京之時，派中使賞賜「龍茶」以示榮寵。文中高太后之「龍茶」，即當時最名貴的密雲龍，蘇軾將之與賓客、友朋分享，作〈行香子·茶詞〉：

⁷⁴ 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頁 222。

⁷⁵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1 版 1 刷），冊下，頁 1416。

綺席纔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鬥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⁷⁶

關於此詞，宋·傅幹註說：「供御茶品曰龍茶，為雲龍之象，以金縷之。」⁷⁷這是密雲龍得名的由來。蘇軾大方不藏私，將密雲龍與好友分享，也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榮耀，全詞充滿了愉悅的氛圍。明·楊慎《詞品·密雲龍》亦載：

密雲龍，茶名，極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東坡之門，公大奇之。時黃、秦、張耒、晁補之號蘇門四學士，東坡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之四學士，窺之，乃廖明略也。⁷⁸

由上記載，可知蘇軾極喜愛密雲龍，視為珍寶，只有最好的親友、最看重門人才能與他分享。蘇軾雖喜歡茶，但他堅決反對以樂害民，故〈荔支歎〉詩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如果因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傷害百姓，他寧願放棄這種享受，甚至祝禱天地不要出產這種會為百姓招來禍害的美好物品。當時，英明的高太后也具有這種仁心仁德，難怪她會特別賞識、拔擢蘇軾，可與程夫人、王弗、王閏之、王朝雲並列為影響蘇軾一生最深的五位女子。

⁷⁶ 〈行香子·茶詞〉，見宋·蘇軾撰，鄒同慶、王宗堂編校，《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1版1刷），冊中，頁599。

⁷⁷ 見宋·傅幹注，劉尚榮校證，《傅幹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7月，1版1刷），頁183。

⁷⁸ 明·楊慎《詞品·密雲龍》，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2月，台1版），冊1，頁470。

高太后推行元祐更化，斟酌改善元豐舊法，⁷⁹下令廢止建州精製、進貢密雲龍與小龍團。始於丁謂，盛於蔡襄，歷時將近一百年的宋代建州貢茶史暫告中斷。宋·張舜民《畫墁錄》載：

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為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歎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⁸⁰

宋·周輝《清波雜志校注·密雲龍》亦載：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⁸¹

高太后認為帝王精挑好茶來喝，並不會增添聰明才智，無補於政事，反而增加百姓的負擔，故毅然下令福建路轉運使不得再精製、進貢小龍團與密雲龍，高太后勤儉自持、愛民如子的仁心仁德令清·王士禎崇敬不已。《分甘餘話·宋元祐禁福建造貢茶》載：

宋·丁謂為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元祐初宣仁皇

⁷⁹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祐元年正月庚寅紀事：「改元」，李燾自註云：「呂陶《紀聞》：『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變，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令然，至於年號，亦對鈞矣。』」然謔戲之談亦有味，此可見當時改元意，姑附注此。」冊15，頁8697。

⁸⁰ 宋·張舜民《畫墁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167。

⁸¹ 見《清波雜志校注·密雲龍》，頁154。

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言實可為萬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⁸²

高太后抑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減損自己的口體之養，廢除建州貢茶舊制，乍看雖是小事，然由小窺大，高太后秉仁心、行仁政的意志性行完全表露無遺，不愧是女中豪傑。《宋史·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傳》載：

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逎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⁸³

宋哲宗幼年嗣位，高太后權同聽政，謹守分際，進用賢人，施行仁政，史稱元祐之治媲美仁宗盛世。高太后為何能有此種成就？吾人從她下令廢止精製、進貢密雲龍與小龍團一事就可得到答案。宋·王稱《東都事略·世家二·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論贊》譽說：

宣仁德及天下，……致治之懿，比跡永昭，其來有自矣。於庠！母后攝政之賢，自秦漢迄今，未有加于我宋者也。真社稷、生靈之福哉！⁸⁴

高太后雖無帝王之名，然其政績卓著，可與宋仁宗嘉祐之治媲美。對高太后來說，這種史評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推崇，也是她該獲得的榮譽與回報。

⁸² 見清·王士禎撰，張世林點校，《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1版3刷），頁13-14。

⁸³ 見《宋史·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傳》，冊11，頁8626。

⁸⁴ 見《東都事略·世家二·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論贊》，冊1，頁276。

只可惜，高太后的仁政，在其崩逝之後，被不肖孫子宋哲宗破壞了，貪圖口腹之欲的他重新恢復建州貢茶的舊制。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載：

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作鬥茶者也，以為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⁸⁵

「瑞雲龍」又稱「瑞雲翔龍」，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載：

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為瑞雲翔龍。

86

高太后於元祐中下令廢除進貢密雲龍，到了元祐末年，福建路轉運使居然推陳出新，精製品質較密雲龍更好的建州鬥茶瑞雲龍，企圖進貢、諂媚高太后。瑞雲龍體式較密雲龍小，但品質更佳，產量更少，故當時的福建路轉運使企圖以此邀寵高太后，沒想到被高太后斷然拒絕了。高太后廢除建州貢茶的決心的確值得稱美，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即崩殂。宋哲宗親政後，於元祐九年（1085）四月十二日，下詔改元，將元祐九年改為紹聖元年，正式宣告天下，朝廷即將繼承、恢復宋神宗的新政。⁸⁷此時，這位鮮廉寡恥的福建路轉運使觀察政治風向，見機不可失，立即上章請貢鬥茶瑞雲龍，宋哲宗欣然接受。宋哲宗之所以恢復建州貢茶，除了驕奢養欲，貪圖物質享受之外，銳意紹述，務求推翻高太后元祐之政也是原因之一。

元祐年間，高太后曾任命蘇軾擔任翰林侍讀學士，令其陪侍經筵，用心教導宋哲宗，希望能將他培育成一位英明國君。蘇軾受高太后重託，深感責任重大，

⁸⁵ 宋·王鞏《甲申聞見二錄補遺》，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頁 222。

⁸⁶ 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637。

⁸⁷ 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元祐黨案》載：「（紹聖元年甲戌）四月，章惇相，以曾布為翰林學士、張商英為右正言。布請改元，以順天意，明紹述。」（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7 月，1 版 2 刷），冊 4，頁 3175

戰戰兢兢，全力以赴，曾費心「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為一書以備進讀。」⁸⁸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亦載：

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聖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⁸⁹

蘇軾也受到宋哲宗的敬愛，曾賜茶示寵，令其倍感尊榮，宋·王鞏《隨手雜錄》載：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哲宗眷遇如此，復為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⁹⁰

宋哲宗幼年嗣位，宣仁高太后盡心護持，「臨朝九年，於寢食起居，所以調護於哲宗者，懇惻周盡。」⁹¹沒想到高太后病危之後，宋哲宗不知感恩圖報，發揚元祐之治，反受奸人蠱惑，銳意紹述，擯排正人君子。元祐八年（1085）九月十五日，國事將變，「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以來，朝暮怊怊。」⁹²蘇軾自認「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遂與范祖禹聯名向宋哲宗上〈聽政劄子〉，力勸宋哲宗不要聽信「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的離間讒

⁸⁸ 參見宋·李廌撰，《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台北：藝文印書館，未載出版年月與版次），頁1。

⁸⁹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1421。

⁹⁰ 宋·王鞏《隨手雜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212。

⁹¹ 見《東都事略·世家二·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冊1，頁265。

⁹² 宋·張舜民《乞留范純仁奏》，見《全宋文》冊41（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10月，1版1刷），頁686。

言，務必依循謹守太皇太后的元祐法度，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⁹³可惜，宋哲宗此時已聽不進任何忠諫。二十六日，蘇軾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將赴定州知州任，依例當上殿面辭，宋哲宗竟悍然拒絕，下旨令其直接離京赴任，蘇軾對此極悲憤，作〈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

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為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⁹⁴

宋哲宗銳行紹述，斷然拒絕蘇軾上殿面辭，令蘇軾極不滿，極失望，作〈朝辭赴定州論事狀〉教訓宋哲宗，最後甚且直斥說：「此何義也？」指責宋哲宗的言行不成體統！不合義理！滿腔忠義與悲憤，讓蘇軾在不知不覺之間提高了聲調。此時的宋哲宗不再是神聖崇高、凜然不可冒犯的帝王，倒像是行為偏差亟待師長導正的學生；此時的蘇軾不再是畢恭畢敬、誠惶誠恐的臣子，而是教導帝王的侍讀大學士，是帝師，是諤諤之士！蘇軾〈荔支歎〉之斥責宋哲宗，其寫作心境與當年作〈朝辭赴定州論事狀〉斥責宋哲宗完全相同。

其後，蘇軾由定州歷經貶謫，於紹聖元年十月二日抵達惠州貶所。蘇軾在惠州見宋哲宗所行皆不合治道，又聽聞宋哲宗毀棄高太后德政，恢復建州貢茶，蘇軾義憤填膺，於品賞荔枝之餘，巧作〈荔支歎〉，引物連類，借題發揮，層層逼進，加以譏刺：「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並自註說：「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鬥茶，許之。」從大龍團到小龍團，從密雲龍到瑞雲龍，蘇軾譏刺佞

⁹³ 〈聽政劄子〉，參見《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冊6，頁2427-2430。

⁹⁴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見《蘇軾文集》，冊3，頁1019。

臣爭相精製、進貢更新更好的團茶博取帝王的歡心。蘇軾自註之「鬥茶」，指的就是建州鬥茶瑞雲龍，是當時最好、最新的茶品，是福建路轉運使用以「爭新買寵」的利器。所謂「鬥茶」，本是一種品茗競技，宋代建州鬥茶之風最盛，蔡襄〈茶錄·論茶·點茶〉載其法云：

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蔡襄自註：「建人謂之雲腳、粥面。」）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視其面色鮮明，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鬥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⁹⁵

建州人稱「鬥茶」為「茗戰」，而「茗戰」優勝之茶亦稱「鬥茶」，夠資格上貢朝廷，故「鬥茶」也用以指稱最名貴的建茶，是參加鬥茶比賽獲得優勝的最上好茶，猶如今日台灣的「比賽冠軍茶」。《中國名茶志·福建卷·福建名茶概述·名茶文化·品茗變革》釋說：

宋代的福建鬥茶實際上在唐代已有，唐代馮贄《記事珠》提到「建人謂鬥茶為茗戰」，不過到宋代鬥茶才大盛。宋時建溪上游的名茶產區武夷山，每當新茶製成後，茶農便在競臺展開評比新茶活動，比品質優劣。鬥輸贏，互炫其優，優則稱勝，可以充官茶進入北苑貢茶行列。當時鬥茶，不僅有下場參賽的茶農、僧侶，而且還有地方官員、文人雅士和若干圍觀的百姓，場面十分熱鬧，人們把它當作一種精神享受，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中，充分描寫了建州武夷山的鬥茶場面和盛況。宋時飲茶之風頗為盛行，不但民間「比屋皆飲」而王室以及權貴之飲，尤為講究，官吏們為取寵帝王，爭獻奇茗，在製法上標新立異，推行鬥茶法，評選佳品上貢取寵，所以至宋朝以來建茶最為名貴。⁹⁶

⁹⁵ 〈茶錄·論茶·點茶〉，見《蔡襄全集》，頁 673。

⁹⁶ 見王鎮恒、王廣智主編，《中國名茶志·福建卷·福建名茶概述·名茶文化·品茗變革》（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 年 12 月，1 版 1 刷），頁 345。

宋·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所描寫的就是建州採製鬥茶與茗戰盛況：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
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嘻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
終朝採掇未盈襜，惟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汝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冷水。
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薄蘭芷。
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97

北宋建州鬥茶，獲勝者獲獎賞，榮耀加身，如在雲端；失敗者，如戰敗之將，眾人訕笑，自以為恥，這種情況跟臺灣茶農之「春茶比賽」、「冬茶比賽」有點相似。在蘇軾的年代，建州鬥茶數量極少，是萬中選一的精品，宋·黃儒《品茶要錄·二白合盜葉》載：

茶之精絕者，曰鬥，曰亞鬥，其次揀芽。茶芽，鬥品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勢無窮，而人之耳目有盡，故造鬥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負而後勝者，雖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可得而擅也。其造，一火曰鬥，二火曰亞鬥，不過十數銖而已。揀芽則不然，遍園隴中擇其精英者爾。⁹⁸

精製建州鬥茶，一處茶園只能挑選一棵最好的茶樹，採摘其最嫩之茶葉精製成鬥茶，其珍貴自可想見。黃儒，字道輔，福建建州建安人，生性恬淡，博學能文。黃儒生於團茶的故鄉建州，本地人寫本地物產，能發人之所未發，蘇軾與之交好，對其人其書備極推崇，〈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譽說：「委曲微妙，皆陸鴻

⁹⁷ 宋·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1版1刷），頁1868。

⁹⁸ 宋·黃儒《品茶要錄·二白合盜葉》，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631-632。

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⁹⁹黃儒與蘇軾同時，是建茶的專家，蘇軾對其論著又極稱揚，因此吾人以黃儒之言發明蘇軾〈荔支歎〉詩意可謂切當。當時，建州鬥茶瑞雲龍進貢至汴京的時間是三月，而蘇軾〈荔支歎〉作於五、六月間，兩者相距不遠，相當具有時效性，亦可看出蘇軾對宋哲宗的極度不滿，才會快速寫詩加以譏刺。清·紀昀評說：「波瀾壯闊，不嫌其露骨。」¹⁰⁰由於蘇軾對宋哲宗恢復建州貢茶之舉痛心疾首，深惡痛絕，在這種情境之下寫成的〈荔支歎〉，無論是譏刺佞臣或批判昏君，自然直接明顯，毫不含蓄，毫無保留；不過，因為全詩正義凜然，氣勢雄壯，與內容配合得當，所以讀來但覺痛快淋漓，踔厲風發，不會流於叫囂怒罵而缺乏詩歌的質感與美感。在蘇軾刻意斂才學陶、力求淡遠的嶺南詩風裡，〈荔支歎〉確實呈現異樣的風格，內心的悲憤讓詩作再現豪壯本色，再度展露以詩批判時政的習性，這也是〈荔支歎〉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

可惜的是，時至今日，那位向宋哲宗「乞進鬥茶」的福建路轉運使已不可考，無法加以譴責。不過無妨，這位佞臣不是蘇軾〈荔支歎〉譏刺的主要對象，故未點名道姓加以譏刺，而把譏刺的對象、批判的主力擺在最高層次的「吾君」——當今聖上宋哲宗。蘇軾再次利用以註明詩的手法，說明宋哲宗允許福建路轉運使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的時事，矛頭一轉，立刻由譏刺佞臣擴展為直斥乘輿：「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蘇軾這兩句詩，既譏刺福建路轉使不該貢茶買寵，只求滿足宋哲宗的物質欲望，這是佞臣之行，是宮妾之道，讓人厭惡，讓人鄙視；但蘇軾真正的詩意是斥責宋哲宗驕奢養欲，身為一國之君只求致養口體，只知追求物質的享受，只求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不求養牧兆民，不求養護社稷，不養德，不養心，不養正，真是一位低俗淺陋、讓人鄙視的昏君。「陋」是低俗粗鄙之意，或用作臣下謙卑之詞，或用以貶斥人物、情事，沒想到蘇軾〈荔支歎〉竟用以指斥宋哲宗，毫不避諱，無所顧忌。由此看來，蘇軾〈荔支歎〉對丁謂、蔡襄貢茶的譏刺，只是一種陪襯，並非主要作意，只是為斥責宋哲宗預作鋪排。〈荔支歎〉題面之「歎」，蘇軾主要悲歎的是宋哲宗之驕奢縱欲，其次才是悲歎佞臣貢物買寵的陋行。風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從之，只要帝王不嗜名

⁹⁹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見《蘇軾文集》，冊5，頁2067。

¹⁰⁰ 見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頁752。

茶，不貪圖物質享受，官吏就不會貢茶諂佞，高太后就是最好的例證，所以論究貢茶罪惡的源頭，必當歸結於最高統治者。何況，亡者已矣，來者猶可追，無論是貢茶之丁謂、蔡襄，或是接受貢茶之宋太宗、宋仁宗，皆已作古，譏刺何用？縱然加以鞭屍也換不回建州人民的血淚。宋哲宗則不然，此時年僅十九歲，春秋鼎盛，來日方長，若能幡然醒悟悔改，不僅是建州百姓的福氣，更是所有宋代子民的福氣。因此，蘇軾忠言直諫，當頭棒喝，希望能警醒宋哲宗，宋·黃徹認為此乃「補世之語，不能易也。」¹⁰¹可謂深得蘇軾詩心。須知，蘇軾曾任侍讀大學士，對宋哲宗有很深厚的感情，自稱「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¹⁰²正因為愛之深，責之切，所以蘇軾〈荔支歎〉犯顏直諫，語雖冒犯，其內心對宋哲宗實有很深的期待，衷心希望宋哲宗不要驕奢養欲，只知供養自己，不知養牧兆民，不知養護社稷，要及時改正眼前政事的錯誤。這種情境就像一位道貌岸然的嚴厲師長正在訓誡犯錯的學生，或許他的口吻很嚴厲，講話很難聽，但他的內心卻對這位學生充滿期待，期待他能洗心革面，改正過失，重新做人。只可惜蘇軾的苦心白費了，蘇軾的期待落空了，宋·王稱《東都事略·哲宗皇帝本紀·論贊》評說：

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虜！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¹⁰³

《宋史·哲宗本紀·論贊》評說：

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招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

¹⁰¹ 宋·黃徹《碧溪詩話》，見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冊上，頁368。

¹⁰²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見《蘇軾文集》，冊3，頁1019。

¹⁰³ 見《東都事略·哲宗皇帝本紀·論贊》，冊1，頁196。

豐舊姦孽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¹⁰⁴

宋哲宗在位十五年，前後期政治差異極大，先盛後衰，令史家感歎不已。蘇軾〈荔支歎〉對宋哲宗的譏刺、斥責是正確的，他的確是位驕奢縱欲的昏君。雖然，後來宋哲宗也曾感歎為奸佞所誤，¹⁰⁵但一切都已太遲了。蘇軾〈荔支歎〉的悲歎與後世史家評論宋哲宗的感歎，似乎遙遙相應。不過，史家將宋哲宗的過失全歸咎於紹聖新黨之蠱惑，似未必公平，宋哲宗昏庸無能，只知養欲，不知養德，不知養牧兆民，不知養護社稷，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袁高，字公頤，唐滄州東光人，主要仕歷在代宗、德宗二朝，任湖州太守時，因職務所需，負責監製顧渚名茶進貢朝廷，作〈茶山詩〉云：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晷輟耕農耒，采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敲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麟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工，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蠹，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愈艱勤。況減兵革困，重滋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¹⁰⁶

袁高此詩悲憫湖州百姓採茶、製茶的辛苦，譴責貢茶取媚的奸佞，譏刺貪圖逸樂的帝王，可與蘇軾〈荔支歎〉參看相發明。所不同者，袁高體恤民病，寫百姓採製顧渚名茶的辛苦極詳細，刻畫入微，絲絲入扣，然對奸佞及帝王的譏刺卻委婉

¹⁰⁴ 見《宋史·哲宗本紀·論贊》，冊2，頁354。

¹⁰⁵ 如《東都事略·章惇傳》載：「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冊3，頁1473。

¹⁰⁶ 唐·袁高〈茶山詩〉，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12月，未載版次），冊5，頁3537。

空泛。蘇軾〈荔支歎〉則反是，把砲火對準本朝獻茶買寵的佞臣丁謂、蔡襄及淫奢縱欲的當今帝王宋哲宗，點名道姓，火力全開，絲毫不留情面。兩者相較，袁高〈茶山詩〉詩風古雅，委婉諷諫，合於溫柔敦厚的詩教；蘇軾〈荔支歎〉新奇剛健，直刺無隱，力透紙背，溫柔敦厚雖不如袁高〈茶山詩〉，對當朝昏君、滿朝佞臣的批判卻遠勝之。

蘇軾此時雖已謫居惠州，但以權相章惇為首的政敵並未就此鬆手，依然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宋·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云：「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宋·任淵註說：「東坡以紹聖元年安置惠州，時章惇為宰相。」¹⁰⁷黃庭堅〈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又云：「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宋·任淵又註說：「山谷跋東坡和陶詩云：『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亦此意也。」¹⁰⁸可見當時章惇欲殺蘇軾之心，人人盡知，企圖利用其表哥兼姊夫程之才到惠州殺害蘇軾正是章惇的傑作。¹⁰⁹雖然政治情勢如此險惡，蘇軾在惠州仍然推行種種義舉，為當地軍民做了許多慈善事業。宋·費袞對蘇軾這種仁心義行最有體會，《梁谿漫志·東坡謫居中勇于為義》譽說：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為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為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為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

¹⁰⁷ 見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溫注，《山谷詩內外集註》（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頁920。

¹⁰⁸ 見《山谷詩內外集注》，頁913。

¹⁰⁹ 參劉昭明撰，〈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見《文與哲》編輯委員會編輯，《文與哲》，第7期，2005年12月，頁209-249。

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于為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¹¹⁰

其實，費袞《梁谿漫志》所載，並未完備。蘇軾在惠州所從事的義行，計有施藥救人、收葬暴骨、平反冤獄、建造東新橋與西新橋、建香積寺機碓水磨、築海會院放生池、救助風災與火災、免除稅役掊剋、建造駐軍營房等事項。¹¹¹《論語·里仁》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¹¹²這是孔子對仁義君子的一種高標準要求，而蘇軾正是符合這種要求的仁義君子。蘇軾無論何時何地都一心為人民謀福求利，縱然獲罪遠謫，顛沛流離，依然不計禍福，為百姓貢獻心力，反映心聲，解決困苦，蘇軾〈荔支歎〉正是這種心境下的產物，其來有自，不足為奇。元祐年間，蘇軾作〈乞郡劄子〉云：

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毀謗，臣遂得罪。¹¹³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亦稱：

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¹¹⁴

¹¹⁰ 宋·費袞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378。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亦載蘇軾謫居惠州：「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見《欒城集》，冊下，頁1421。

¹¹¹ 參劉昭明〈宋·費袞《梁谿漫志》「東坡謫居中勇于為義」考論〉，見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輯，《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頁119-171。

¹¹² 魏·何晏等撰，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里仁》，見《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10月，4版），冊8，頁5364。

¹¹³ 〈乞郡劄子〉，見《蘇軾文集》，冊3，頁829。

¹¹⁴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欒城集》，冊下，頁1414。

蘇軾自認作詩諷刺朝政之缺失，是身為詩人應盡的責任，是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表現，是自己表達政見的特殊手段。如今，蘇軾雖遠謫惠州，情勢危殆，自保不暇，猶奮不顧身，以詩諷諫，庶幾感悟宋哲宗，其忠君愛國之思遠勝過那些貢茶買寵的佞臣。雖然如此，蘇軾〈荔支歎〉譏刺時政，指斥宋哲宗，很容易被政敵扣上大逆不道、指斥乘輿的罪名。依宋代律法，凡是，批評君王，議論君王，無人臣之禮，皆觸犯「指斥乘輿」之罪，這是大惡不赦的死罪，該施以「斬刑」。¹¹⁵本年十一月，開封百姓呂安即因指斥宋哲宗，觸犯指斥乘輿之罪，被判處斬刑。¹¹⁶蘇軾本人也曾有過這樣的恐怖經驗，元豐二年，蘇軾被政敵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等人指控寫作詩文「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譏切時事」、「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謫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訕上罵下，法所不宥」、「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¹¹⁷因而被抓入御史臺，求處死刑。幸賴宋神宗憐憫，眾人營救，才死裡逃生，竄謫黃州。殷鑑不遠，蘇軾又不顧禍福，再度譏刺當前聖上，直斥宋哲宗之失，真令人為他捏一把冷汗。不過，見義勇為，不計禍福，見不平事不吐不快，正是蘇軾本色。宋·王稱《東都事略·蘇軾傳》評說：

受之於天，超出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¹¹⁸

王稱稱譽蘇軾被貶到嶺海，卻一點也不以為意，胸中所蘊藏的浩然正氣不受屈撓，毫無影響。蘇軾這種修養超出眾人之上，無人能及，真是人中之龍。蘇軾〈荔

¹¹⁵ 參見宋·竇儀等撰，薛梅卿點校，《宋刑統·職制律·指斥乘輿》載：「諸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1版1刷），頁186。

¹¹⁶ 參見《宋史·哲宗本紀二》，冊2，頁341。

¹¹⁷ 〈監察御史裡行何大正劄子〉、〈監察御史裡行舒亶劄子〉、〈御史中丞李定劄子〉、〈國子博士李宜之狀〉，參見宋·朋九萬編錄，《東坡烏臺詩案》（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頁1-4。

¹¹⁸ 見《東都事略·蘇軾傳》，冊3，頁1449。

支歎〉言人所不敢言，正是蘇軾謫居嶺海時期最能展現過人氣節的詩篇，是「邁往之氣，折而不屈」的代表作。只是，在政敵環伺的情況下，蘇軾能逃過一劫實屬萬幸。

杜牧作〈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主要是在譏刺唐玄宗與楊貴妃之窮奢極欲，然寫作之時譏刺對象早已不在人世，空有譏刺之言，實無補於當時，已無法扭轉「顛阮仆谷」、「驚塵濺血」的悲劇，也不能彰顯作者冒犯龍顏、以詩諷諫的勇氣。北宋文網遠較唐代嚴密，蘇軾本身就是文字獄的受害者，可是他依然甘冒斧鉞，繼承杜牧作意，引物連類，層層進逼，擴大、深化譏刺的人事，將譏刺人事由漢唐貢荔擴大到本朝貢茶，將譏刺人物由漢和帝、唐玄宗、楊貴妃、李林甫等前朝帝王權貴擴大到本朝名宦丁謂、蔡襄，最後逼出主旨，譏諷時政，指斥當今聖上宋哲宗驕奢縱欲，醜陋可鄙，其膽識勇氣令人動容。清·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評說：

悼古諷今，賓主相形，細繹而出，極見筆妙。¹¹⁹

趙氏稱譽〈荔支歎〉的藝術成就，卻忽略了蘇軾作詩之精神。蘇軾喜歡以詩譏刺政治，臧否人物，〈荔支歎〉不僅是蘇軾謫居嶺海時期政治諷諭詩的代表作，批判對象層級之高、人事之廣、力度之強在蘇詩中排名第一，而作於遠謫南荒政敵環伺自顧不暇的時空背景，更能彰顯其不畏險惡、為民喉舌、直言極諫的勇氣與膽識，這是蘇軾生命的特質，是他一生立身的準則。王水照〈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論說：

蘇軾自幼崇拜東漢時因反對宦官而死的名士范滂，以「忘軀犯顏之士」自居。他考制舉，又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取入第三等（宋時取第三等者僅四人），更使他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自負，一心要博取「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名節」。這就使他跟王安石、司馬光、章惇等各朝宰相的

¹¹⁹ 見清·趙克宜撰，《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冊3，頁1480。

議論常常處在既定的敵對地位。司馬光曾自慚在反王安石時，他不及蘇軾、孔文仲（也是「制舉」入三等的四人之一）敢於進言，劉安世也稱述「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指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¹²⁰

王水照的評論頗能掌握蘇軾生命的特質，但所論猶未完備，因為蘇軾不僅常和權相處在「敵對地位」，甚至也常和當朝帝王處在「敵對地位」！如宋神宗推行新法，蘇軾卻寫作詩文譏評新法的缺失，最後釀成烏臺詩案，蘇軾因此銀鐐入獄，被抓入御史臺關了一百三十天，最後死裡逃生，貶謫黃州；此際宋哲宗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蘇軾竟作〈荔支歎〉指責他驕奢縱欲。正因蘇軾一生以名節自持，抗節不附，「一肚皮不合時宜」，¹²¹所以屢遭貶謫，初貶黃州，再貶惠州，三貶儋州，顛沛流離，備嘗艱辛，歷盡折磨，蘇軾謫居嶺海也曾自我感歎說：「東坡何事不違時！」¹²²然而，也因為這種不佞帝王、不懼權貴、不畏罪罟的風骨與勇氣，使蘇軾〈荔支歎〉衝出杜牧的藩籬。王水照〈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論說：

蘇軾的許多政治詩，包括被列入「烏臺詩案」的不少詩作，和新法並沒有關係。這些詩篇表明，作者的政治視野比較廣闊，敢於揭露社會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了下層人民的一些苦難生活。……直至晚年，在經過「烏臺

¹²⁰ 〈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見王水照撰，《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1版1刷），頁137-138。

¹²¹ 宋·費袞《梁谿漫志·侍兒對東坡語》載：「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384。這是一條寶貴的材料，它呈現了蘇軾與朝雲的家居生活情趣，也表露出朝雲的慧黠聰敏。不奴顏婢膝，不苟合取容，卻能巧發奇中，一語破的，朝雲對蘇軾的立身行事確有充分認知。其它侍兒所稱之「文章」、「識見」，固蘇軾之所優為，其一生亦以此獲知於人，見知於世，然這些都不足以代表蘇軾，只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不入時宜質性，才是蘇軾千古獨具的偉大風範。所以說，別的侍兒都不是真正了解蘇軾，只有冰雪聰明的朝雲才是他的紅粉知己。

¹²² 〈次韻子由三首·椰子冠〉，見《蘇軾詩集》，冊7，頁2269。

詩案」以後，他仍然用詩干預政治，直斥時弊，著名的如〈荔支歎〉。杜牧寫荔枝說：「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蘇軾此詩開篇有意相反：「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阮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一個說「無人知」，詞意含蘊；一個直寫「知」，渲染出一幅塵土飛揚、死者滿途的慘象。蘇詩接著又說：「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也比杜詩的妃子笑寫得筆酣墨飽，對比鮮明。這種藝術上的不同來源於蘇軾政治憤激的強烈。不僅如此，蘇軾寫歷史上的進貢荔枝，是為了指斥當朝風行一時的貢茶和貢花，而且指名道姓地譴責當時名臣丁謂、蔡襄、錢惟演：「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把他們比作唐朝貢荔枝的權奸李林甫，獻媚邀寵，殘民以逞。這種批判精神是有進步性的。

123

王水照認為〈荔支歎〉的藝術構思與批判精神遠勝杜牧之作，這是無庸置疑的，至於說蘇軾作〈荔支歎〉是「用詩干預政治」，「干預」二字用得過重，未得詩心。試問，此時蘇軾已是遠謫南荒的罪人，自保不暇，如何干涉、過問政事？王水照之言明顯過當，而且忽略了蘇軾〈荔支歎〉對宋哲宗恢復建州進貢鬥茶瑞雲龍的譏刺。蘇軾作〈荔支詩〉的本心不是要「用詩干預政治」，用蘇軾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用愛弟蘇轍的話來說，這是「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在政治上，蘇軾或許是失敗了，但若論文學表現與人格示範卻非常成功，〈荔支歎〉是宋代政治諷諭詩的典範，蘇軾之危言危行、獨立不回更是詩人的典範。

¹²³ 〈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見《蘇軾研究》，頁139-140。

五、譏刺錢惟演洛陽貢花

蘇軾〈荔支歎〉引物連類，由貢荔而貢茶，由譏刺漢唐帝王權貴進而批判本朝佞臣，最後更譏刺時事，指斥乘輿，諷刺昏君宋哲宗驕奢縱欲，全詩的譏刺於此達到最高點。沒想到，蘇軾行筆至此，意猶未盡，臨去秋波，窮情盡變，於結尾盪開詩筆，以悲歎錢惟演洛陽貢花買寵作結，作法奇特：

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蘇軾自註：「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

吳越王錢俶不戰而降宋，卒諡「忠懿」，追封為「秦國王」，宋太宗為廢朝七日，備禮發冊，譽稱「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¹²⁴故蘇軾〈荔支歎〉稱錢家為「忠孝家」，宋·王稱《東都事略》亦稱美錢俶性行足當「忠孝」之名，是以能全己身、保社稷、庇子孫：

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太祖世，俶遂委質來朝。于時，太宗及群臣咸欲留俶而取其地，太祖卒遣還國，且語之故。烏虜！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及位，俶不待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¹²⁵

宋人普遍稱美錢俶之性行，對其子錢惟演則反是。錢惟演，字希聖，從父歸朝，雖出身「忠孝」之家，性行卻不佳。宋·曾鞏《隆平集·錢惟演傳》評說：

其為人少誠信，初附丁謂，力排準，其後逐謂，亦與有力焉。¹²⁶

¹²⁴ 見《宋史·世家三·吳越錢氏》，冊17，頁13906。

¹²⁵ 見《東都事略·錢惟演傳》，冊1，頁414-415。

¹²⁶ 宋·曾鞏《隆平集·錢惟演傳》，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1，頁118。

為了功名利祿，錢惟演翻雲覆雨，無所不為，連寇準、丁謂兩位炙手可熱的權貴都難逃其算計。《宋史·錢惟演傳》載：

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之為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並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逾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壟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陽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¹²⁷

這段史實，說明了錢惟演不惜一切追求功名利祿的陋行與出判洛陽的時空背景，蘇軾〈荔支歎〉譏刺錢惟演進貢牡丹、諂媚買寵的情事即發生於此時。

錢惟演洛陽貢花，是師法李迪長安貢花。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七月，李迪由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改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¹²⁸隔年春，長安牡丹花開，李迪貢花宋真宗。洛陽牡丹花更盛於長安，三月觀賞牡丹花是當地一大盛事，不分男女，不分貧富，大家都樂在其中。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

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¹²⁹

¹²⁷ 見《宋史·錢惟演傳》，冊13，頁10341。

¹²⁸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庚午紀事，冊4，頁1941。

¹²⁹ 見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頁186。

洛陽人雖愛賞牡丹，但自己培植，自己觀賞，從未貢花汴京帝廷。沒想到，宋仁宗天聖八年，自請出守洛陽的錢惟演，「屢徙藩鎮，鬱鬱不得志。」¹³⁰為邀聖眷，竟師法李迪，首創洛陽進貢牡丹花，企獲柄用。錢惟演酷愛牡丹，在洛陽搜集牡丹多達九十餘種，¹³¹他要向宋仁宗邀寵，所貢花品自然不會是普通品種，而是洛陽最珍貴、錢氏最鍾愛的牡丹花王「姚黃」、花后「魏花」。「魏花」，宋人或稱之為「魏紫」。宋·歐陽脩〈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載：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¹³²

〈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又載：

洛陽自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¹³³

¹³⁰ 宋·曾鞏《隆平集·錢惟演傳》，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1，頁118。

¹³¹ 歐陽脩〈洛陽牡丹記·花品序第一〉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見《歐陽脩全集》，冊3，頁1096。

¹³² 〈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見《歐陽脩全集》，冊3，頁1099。宋人邱濬，字道源，自號「迂愚叟」，為牡丹花著書十卷，名曰《洛陽貴尚錄》，又作〈牡丹榮譽志〉，亦以「姚黃為王」、「魏紅為妃」。參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牡丹榮譽志》，頁462。

¹³³ 〈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見《歐陽脩全集》，冊3，頁1101-1102。

錢惟演為了討好宋仁宗，大費周章，妙出巧思，於清晨剪下帶枝鮮花，蠟封花蒂，強化與枝梗的連結，使不易脫落，再裝進竹籠，籠內空隙用蔬菜葉包裹密封固定保濕，派專人快馬飛送，於黃昏時分送達汴京皇宮，可供宋仁宗觀賞數天不會凋謝。錢惟演洛陽貢花時，歐陽脩任西京推官，為錢氏幕僚，兩人相處甚歡，曾多次共同賞論牡丹，故所記錢惟演洛陽貢花之法翔實可信，可用以發明蘇軾〈荔支歎〉詩意。「姚黃」與「魏花」雖並稱花王、花后，然「姚黃」後出，花美色正，枝葉穠綠茂盛，數量稀少，「一歲不過數朵」，人情喜新厭舊，以稀為貴，故「姚黃」遠較「魏花」珍貴。歐陽脩〈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載：

姚黃一接頭值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值錢五千，今尚值一千。¹³⁴

為求樹大花美，洛陽牡丹之栽植最重嫁接，一株「姚黃」接穗時價五千錢，有錢未必買得到，而一株「魏花」接穗才值一千錢，兩者價差多達五倍。洛陽人珍視姚黃，寧願用熱水燙熟接穗，也不輕易送給覬覦的權貴，沒想到錢惟演一來卻破壞此種優良風俗，主動以之進獻內廷。正因為「姚黃」是牡丹的極品，是洛陽牡丹的代表，故錢惟演貢花雖包含「姚黃」與「魏花」，蘇軾〈荔支歎〉僅標舉「姚黃」以概其餘。自錢惟演洛陽貢花之後，成為常例，每年都要貢花給朝廷，花色以「姚黃」為主，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

姚黃初出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¹³⁵

貢花既久，不肖官員為諂媚帝王，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為當地百姓帶來禍害與負擔。《邵氏聞見錄》又載：

¹³⁴ 〈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見《歐陽脩全集》，冊3，頁1102。

¹³⁵ 見《邵氏聞見錄》，頁186。

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時，官遣吏監護，甫開盡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花如租稅。」余為之歎息。¹³⁶

錢惟演貢花，是將帶枝「姚黃」巧妙保鮮進貢內廷，數量不多，也不會傷害到母株；可是演變到後來，官府竟派人列籍看管民間園圃栽植的姚黃，花一開立即連根帶土盡數挖送汴京。這種殺雞取卵的惡行，對私人園圃來說，深深傷害他們對牡丹的栽植，而「輸花如輸稅」，也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對洛陽百姓來說，此種惡行導致本地花園、花市再無「姚黃」可以觀賞，嚴重剝奪了洛陽人的公眾權益。雖然這種禍害不是錢惟演當初所預見，但身為洛陽貢花的始作俑者，自然難逃其責，要負起一定的責任，故蘇軾在〈荔支歎〉中加以譏刺：「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並再次以註明詩：「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蘇軾推源究始，責備錢惟演的意味清楚可見，透過以註明詩的手法，如法官斷案，罪證明確，不容狡賴。在蘇軾之前，未曾有人寫詩譏刺錢惟演貢花，時宰晏殊甚至向錢惟演索花，¹³⁷洛陽牡丹儼然是錢氏諂媚帝王、阿諛權貴的最佳公關贈禮。好笑的是，錢惟演用盡心機，最後仍未獲柄用，未能實際拜相，平生以此為恨。¹³⁸錢惟演死後，朝廷議謚，認為錢氏「久處外服，意頗不樂，故其篇詠，率多怨刺。」「附援求益，迎合輕議。」「貪慕權要，鬱生不足。」被惡謚為「文墨」。¹³⁹蘇軾〈荔支歎〉本意是要譏刺錢惟演，然先揚再抑，製造反差，先標舉錢家「忠孝」之名，再感歎錢惟演貢花邀寵之陋行，反諷錢惟演出身好，名位高，卻有愧「忠孝」之名，辱沒家聲，不但愧對先人，也愧對洛陽百姓。因為獻花買寵，假公濟私，絕對不是忠臣事君之懿行，而是佞臣媚君之陋行，不是相君保境安民之善政，而是

¹³⁶ 見《邵氏聞見錄》，頁186。

¹³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絕句》載：「元獻晏公為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頁333。據詩意，錢惟演送牡丹給晏殊，是整株移植，與剪取數朵帶枝「姚黃」進貢宋仁宗者不同。

¹³⁸ 宋·王稱《東都事略·錢惟演傳》載：「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黃紙後著名為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冊1，頁413。

¹³⁹ 宋·張璠《錢惟演謚議》，參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1版2刷），冊2，頁1654-1655。其後經其子孫不斷力訴，錢惟演才改謚「思」，再改謚「文僖」，參見《宋史·錢惟演傳》，冊13，頁10342。

墨吏勞民傷財之惡政。名為忠孝，實則奸佞，以忠孝之名行奸佞之實，以相君之尊行害民之事，反差極大，兩相對照，錢惟演洛陽貢花之失更加彰顯，更讓人不齒。由於在此之前，蘇軾已譏刺佞臣之貢茶買寵及昏君之驕奢縱欲，故詩句譏刺之意已極明顯，可是蘇軾依然詩後加註，以註明詩，指名道姓，直斥錢惟演的陋行，絲毫不留情面。蘇軾對錢惟演的不滿溢於言表，似要天下人看清錢惟演的醜陋嘴臉。

與〈荔支歎〉同樣作意，蘇軾在〈以樂害民〉由揚州芍藥「萬花會」生發推衍，引物連類，擴大譏刺對象與範圍，直斥錢惟演之貢花：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延慶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為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¹⁴⁰

蔡元慶，字仲遠，官至吏部侍郎，「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白是非，所至有惠政。」¹⁴¹蔡元慶人品好，官聲佳，加上未曾擔任揚州知州，故不可能創辦揚州芍藥「萬花會」。文中，「蔡延慶」當為「蔡元長」之誤，蘇軾一時誤記。蔡京，字元長，於元祐四年、五年間任揚州知州，¹⁴²仿洛陽牡丹「萬花會」，創辦揚州芍藥「萬花會」，徵集民間園圃十餘萬枝芍藥花於一處，殘敗私人園圃，造成民病，引發民怨。其後，滕元發、王存、謝景溫、李承之、張瑄繼任揚州知州，因循守舊，不恤民情，照樣舉辦「萬花會」。元祐七年（1092）三月二十六日，蘇軾抵達揚州知州任，此時揚州芍藥盛開，依舊例當舉辦萬花會，蘇軾探知民瘼，毅然廢除之，並預言洛陽萬花會終將被有識之士廢罷。蘇軾正是文中那位鄙視錢惟演的「識者」，因為在此之前無人作詩譏刺錢惟演貢花，蘇軾是第一人，這是

¹⁴⁰ 〈以樂害民〉，見《蘇軾文集》，冊6，頁2293-2294。

¹⁴¹ 見《宋史·蔡延慶傳》，冊12，頁9640。

¹⁴² 參見李之亮撰，《宋兩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揚州》（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6月，1版1刷），頁20。

〈荔支歎〉的創意。蘇軾對自己罷廢芍藥「萬花會」之惠民德政很得意，在揚州作〈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末幅云：

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甌有塵。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

蘇軾自註：

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為此會，用花十萬餘枝，吏緣為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¹⁴³

蘇軾詩語幽默，正話反說，作詩自嘲，但自註則說明自己罷廢揚州芍藥「花會」的真實情況，難掩為民除害的喜悅。蘇軾此項惠民善政獲得宋人張邦基的稱賞，《墨莊漫錄》載：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亦效洛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奸，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為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之。¹⁴⁴

張邦基末尾三句說得好：「公為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思之。」蔡京知揚州，仿洛陽舊例，首創芍藥「萬花會」，民以為病；蘇軾知揚州，罷廢芍藥「萬花會」，人民額手稱慶，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在此。蘇軾在揚州罷廢芍藥「萬花會」的心情，與在惠州作〈荔支歎〉譏刺錢惟演貢花媚上相同，一心惠民利民，

¹⁴³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見《蘇軾詩集》，冊6，頁1872。

¹⁴⁴ 宋·張邦基撰，丁如明校點，《墨莊漫錄》，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5，頁4737。

反對以樂害民，這是蘇軾受百姓敬愛的原因，也是蘇軾寫作〈荔支歎〉批判昏君、佞臣的思想根源。蘇軾〈以樂害民〉一文，由揚州芍藥「萬花會」，延伸至洛陽牡丹「萬花會」，與〈荔支歎〉同樣是運用引物連類的手法，文末譏刺錢惟演之貢花：「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可與〈荔支歎〉「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參看，發明詩意。蘇軾之所以罷廢揚州芍藥「萬花會」，是反對官吏將自己的歡樂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而錢惟演貢花買寵卻是以一己之私而遺害百姓，這是蘇軾所難以容忍的，故一再寫作詩文加以譏刺。所不同的是，蘇軾知揚州可以扮演有腳陽春，劍及履及，為民除害，解民倒懸，立即罷廢芍藥「萬花會」；如今謫居惠州，以罪人之身，既不能跨越時空阻止錢惟演之劣行，又不能廢除洛陽牡丹萬花會，只能形之於歌詠，藉由〈荔支歎〉譏刺錢惟演自私自利、擾民害民的惡行。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載：

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惜之也。

145

胡仔之言未得蘇軾詩心！〈荔支歎〉一路而下，蘇軾鄙視昏君佞臣之意極顯明，故蘇軾詩尾不是為錢惟演貢花陋行感到哀傷、可惜，而是感到可鄙、可恨，這才是蘇軾〈荔支歎〉真正的作意，這種說法才能呼應題面的「歎」字。此處之「歎」，是感歎、悲歎之意，而非惋惜、可惜，錢惟演素行不良，洛陽貢花只是其中之一，這種人實在不值得蘇軾為他「惜」也。蘇軾說得好：「識者鄙之」，此一「鄙」字或許較「惜」字更能精確傳達蘇軾寫作〈荔支歎〉譏刺錢惟演的詩心。

《宋史·錢惟演傳》論說：

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¹⁴⁶

¹⁴⁵ 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頁215。

¹⁴⁶ 見《宋史·錢惟演傳》，冊13，頁10352。

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蓋棺論定，《宋史》對錢惟演的譏評，正是蘇軾〈荔支歎〉「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的最好註腳。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嚴厲批判錢惟演洛陽貢花的詩人，是一位有見識的讀書人，這種見識來自於蘇軾的正義感與對人民的關懷，〈荔支歎〉為「宋代識者」蘇軾留下最好的見證與典範。

蘇軾〈荔支歎〉結尾盪開詩筆，以批判錢惟演貢花買寵收結，然詩中所流露的譏刺之音卻嫋嫋不絕，發人深思，令人慨歎，這就是清·紀昀所譽稱之：「結處又帶一波，更長言不足。」¹⁴⁷蘇軾〈荔支歎〉本以譏刺深度、廣度著稱於世，其藝術技巧之高妙亦為詩家所稱譽。清·汪師韓《蘇詩選評》則評說：

「君不見」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橫在此。詩本為荔支發歎，忽說到茶，又說到牡丹，其胸中鬱勃有不可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¹⁴⁸

所言甚是！蘇軾謫居惠州，見宋哲宗意氣用事，銳行紹述，不分善惡，不識好壞，執意反對高太后元祐善政，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驕奢縱欲，賢人遠謫，奸佞滿朝，國政日下，百感交集，鬱悶壅塞，無法宣洩，遂將滿腔悲憤化為〈荔支歎〉，引物連類，由古轉今，健筆如刀，直刺當朝昏君、滿朝佞臣，這就是〈荔支歎〉之所以爆發強大震撼力的原因。〈荔支歎〉「奇橫」的詩風與蘇軾「鬱勃」的心境完全貼合，詩的批判力有多強烈，代表蘇軾的內心有多悲憤。正因為蘇軾內心太過悲憤，連指斥乘輿也無法完全宣洩，而建州貢茶之譏已達極限，無法再渲染著墨，盡吐心中塊壘；於是蘇軾詩筆一轉，再度運用引物連類的巧思，將建州貢茶之譏推進到洛陽貢花之譏，其事雖異，其情實同，皆源於媚上邀寵之思，錢惟演的陋行與丁謂、蔡襄、「閩中監司」沒有兩樣，所以蘇軾將內心宣洩未盡的悲憤全都傾注在錢惟演身上。這種情境，就像火山第二次爆發，務必將內部熾熱岩漿盡數噴出；就像主地震之後的餘震，務必將地底累積的能量全部釋出，否

¹⁴⁷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752。

¹⁴⁸ 清·汪師韓《蘇詩選評》，見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詩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1版1刷），下編，頁1864。

則地殼將無法承受。〈荔支歎〉詩尾對錢惟演的譏刺，正是蘇軾刻意製造出來的火山再爆炸與主地震之後的餘震，使宋王朝大地上的佞臣再度受到衝擊震撼，〈荔支歎〉譏刺佞臣昏君的作意因此得以無限開拓、延伸：「不僅貢茶的佞臣可惡可鄙，貢花的佞臣一樣可惡可鄙，全天下貢物媚上的佞臣都可惡可鄙，而驕奢縱欲的統治者最可惡最可鄙！」〈荔支歎〉之寫作距今 912 年，可是蘇軾罵盡天下昏君、佞臣的聲吻卻如在眼前，餘音嫋嫋，久久不散，這就是蘇軾〈荔支歎〉的典範與創意。

清人謝啟昆讀《全宋詩》，仿金·元遺山作論詩絕句兩百首，其中論錢惟演云：

西湖酬唱玉河斜，學士流傳忠孝家。屏上牡丹九十種，殷勤愧進洛陽花。

149

謝啟崑江西南昌人，字蘊山，號蘇潭，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進士，博聞強記，以善詩著稱，此詩結合歐陽脩〈洛陽牡丹記〉載述錢惟演於小屏細書牡丹花品九十餘種，與蘇軾〈荔支歎〉末尾對錢惟演的譏刺，頗得蘇軾詩心。不過，這種作意，卻非歐陽脩所樂見，因為他對錢惟演一直心存感念，只有稱美之詞，從無譏評之語。蔡襄貢茶與錢惟演貢花事類相同，邀寵之心相同，諂媚的對象相同，對人民的禍害相同，然歐陽脩的反應卻大不相同。歐陽脩譏評蔡襄之貢茶，認為非讀書人、知識分子所當為，對錢惟演之貢花不但無微詞，還加以稱述，這是歐陽脩的私心。歐陽脩任西京判官時，錢惟演為留守，對他極照顧，歐陽脩對此一直感念在心，思有所回報。相關情事，宋人頗有載述，如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¹⁴⁹

¹⁴⁹ 清·謝啟昆《樹經堂詩初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錢惟演》，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1版1刷），冊1458，頁133。

又載：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諡，永叔之力云。¹⁵¹

邵氏所言不假，錢惟演死後諡號之所以由惡諡「文墨」改為「思」，再改為美諡「文僖」，前後落差極大，正是歐陽脩感恩圖報的具體成果。宋人對錢惟演的性行多有惡評，歐陽脩卻一生敬愛錢惟演，常載述其言行，稱美其厚德，如〈歸田錄〉載：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¹⁵²

這是說錢惟演一生仕宦得意，人所莫及，唯一遺憾的是未能實際執行相權，於黃敕押名而已。〈歸田錄〉又載：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

¹⁵⁰ 見《邵氏聞見錄》，頁81。

¹⁵¹ 見《邵氏聞見錄》，頁82-83。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燕賞逢知己》對錢惟演與歐陽脩賓主相得之樂亦極稱賞，歎稱：「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冊下，卷9，頁7。

¹⁵² 〈歸田錄〉，見《歐陽脩全集》，冊5，頁1932。

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誤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¹⁵³

錢惟演的珊瑚筆架一年內被自家子弟偷走七次，每次都以重金贖回，而始終不悟是自家子弟所偷，還加以厚賜。這有兩種可能，首先錢惟演可能是智障，所以才無法領悟小偷就是自家子弟。其次，錢惟演知道筆架被偷是內賊所為，只是不忍心拆穿責備，所以佯作不知，但求以重金換回筆架。果真如此，錢惟演難逃溺愛不明、縱容子弟之譏，而歐陽脩所稱美之「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這只是假象。以上二者，錢惟演必居其一，不管事實真相如何，錢氏以重金換回筆架的行為實在談不上什麼高潔完美，歐陽脩以「純德」譽之，明顯是溢美之辭，歐陽脩對待錢惟演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歐陽脩譏評蔡襄貢茶，對錢惟演之貢花卻無微詞，即出於感恩心理。歐陽脩因感念錢惟演的厚遇，諱言錢惟演貢花之惡，卻難逃以私心害公義之譏。蘇軾〈以樂害民〉云：「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以此論之，歐陽脩未鄙視錢惟演之貢花，反而形之於篇章，豈是一位有見識的讀書人？蘇軾一生敬愛歐陽脩，這種評論當然不是他的本心，卻是他心中的一種遺憾。昔日歐陽脩曾將「文章之任」付與蘇軾，¹⁵⁴今日蘇軾作〈荔支歎〉直斥錢惟演貢花之惡，彰顯公義，也算是補座師之不足。

蘇軾作〈荔支歎〉時，蘇轍謫居筠州，接獲蘇軾寄詩之後，作〈奉同子瞻荔支歎〉云：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卻霜霰，結子僅與黃金侔。
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
北遊京洛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為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

¹⁵³ 〈歸田錄〉，見《歐陽脩全集》，冊5，頁1921。

¹⁵⁴ 宋·李廌《濟南先生師友談記》載：「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授也。」頁24。

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
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老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
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¹⁵⁵

蘇轍此詩先描述四川荔枝之培植與珍貴，末言蘇軾謫居惠州特別珍愛荔枝，最後期待將來兩兄弟能遇赦返鄉種植荔枝，既解思鄉之情，又可大飽口福。蘇轍詩句平凡，詩意無奇，與蘇軾同題競作，自稱是「奉同」蘇軾之作，內容卻毫不相關，完全未抓住蘇軾〈荔支歎〉的寫作重點，兩相對照，有仙凡之別。不僅蘇轍同題之作比不上蘇軾，清·查慎行認為連以諷諭詩著稱之白居易也相形見绌，《初白庵詩評》論說：

耳聞目見，無不可供我揮霍者。樂天諷諭諸作，不過就題還題，那得如許開拓。¹⁵⁶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對〈荔支歎〉更是推崇備至：

小物而原委詳備，所謂借題。章法變化，筆勢騰擲，波瀾壯闊，真太史公之文。¹⁵⁷

所言甚是！蘇軾〈荔支歎〉之作，由眼前嶺南荔枝生發，先譏刺漢、唐帝王之驕奢荒淫，又聽聞宋哲宗批准福建路轉運使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悲憤填膺，遂引物連類，借古諷今，由貢荔而及貢茶，先譏刺丁謂是貢茶買寵的始作俑者，再譏刺蔡襄踵步丁謂進貢小龍團，進而斥責宋哲宗驕奢縱欲讓人鄙視，最後盪開詩筆，再度引物連類，以譏刺錢惟演洛陽貢花作結，窮情盡變，巧思無窮，關涉史實有漢唐之貢荔，宋朝之貢茶、貢花；關涉歲貢物品有異果、佳茶、名花，包括

¹⁵⁵ 〈奉同子瞻荔支歎〉，見《樂城集》，冊中，頁1124。

¹⁵⁶ 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見《蘇軾資料彙編·詩評》，下編，頁1800。

¹⁵⁷ 見方東樹撰，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6月，1版3刷），頁308。

荔枝、龍眼、小龍團、大龍團、鬥茶瑞雲龍、牡丹姚黃；關涉人物有帝王、權貴、奸相、名宦，包括東漢和帝劉肇、唐玄宗李隆基、楊玉環、李林甫、唐羌、丁謂、蔡襄、吳越王錢俶、錢惟演。蘇軾寫作〈荔支歎〉，巧發妙思，匠心獨運，議論縱橫，氣勢磅礴，變化萬千，確勝過白居易諷諭詩之單調無變化，更非蘇轍平凡無奇的同題之作所能望其項背。

蘇軾作〈荔支歎〉之後三十年，金人南侵，北宋滅亡，宋室南遷，陳與義續作〈荔支歎〉云：

炎精孕秀多靈植，荔子佳名聞自昔。絳囊剖雪出瑯盤，尋常百果無顏色。
閩天六月雨初晴，星火熒煌耀川澤。欸如彩鳳戲翱翔，爛若彤雲堆翕赫。
中郎裁品三十二，陳紫方紅冠儔匹。鹽烝密漬尚絕倫，啄瓊空獻南飛翼。
我聞至和全盛時，貢輸不減開元日。涪州距雍已云遠，況此奔馳來海側。
繡衣使者動輜車，黃紙封林遍阡陌。浮航走轍空四郊，妙品人間無復得。
似聞供給只纖毫，往往盡入公侯室。驪山廢苑狐兔靜，艮嶽新宮輦鼓急。
繁華今古共淒涼，繞樹行吟悲野客。西風括地戰晨昏，一聽胡笳雙淚滴。

158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生於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卒於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陳家與蘇家是世交，蘇軾故鄉四川眉山，陳與義先人來自四川青神，兩地相鄰，誼屬同鄉。陳與義的曾祖父陳希亮，字公弼，不僅是蘇洵的父執輩，更是蘇軾簽判鳳翔的直屬長官；陳與義的祖父陳慥，字季常，是蘇軾謫居黃州時的最好朋友，對蘇軾極照顧，蘇軾在黃州作〈陳公弼傳〉、〈方山子傳〉對陳希亮、陳慥父子的性行有極精彩的描繪。其後，蘇軾謫居惠州，陳慥想要跋涉千里

¹⁵⁸ 見清·康熙敕編，清·汪灝等編，《廣群芳譜·果譜·荔支三·集藻》（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6月，1版1刷），冊3，頁1469-1470。陳與義〈荔支歎〉為佚詩，舊本《陳與義集》未載，宋·陳景沂《全芳備祖集》亦收錄之。參見宋·陳與義撰，白敦仁校箋，《陳與義集·附錄一·佚詩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書缺漏版權頁，故不詳出版年月與版次），冊下，頁970。

遠來探視，經蘇軾去信極力勸止始作罷，蘇、陳兩家交誼之深厚由此可見。¹⁵⁹由於蘇軾作〈荔支歎〉之時與陳慥有書信往來，陳與義的年代與蘇軾相近，兩家又是世交，我們有理由相信陳與義〈荔支歎〉之寫作必然與蘇軾〈荔支歎〉有關，必然讀過蘇軾原作，才会有此同題之作。陳與義曾因寫作〈墨梅〉詩受到宋徽宗的賞識，官職由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快速升遷，對於宋徽宗荒淫無度的逸樂生活有近距離的觀察。靖康之難後，陳與義為避金虜，曾在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浙江等地流離奔逃，生活極困頓，對於北宋帝王的荒淫昏庸與亡國之痛有深沉的體會，對蘇軾〈荔支歎〉譏刺昏君、佞臣的詩意特別有認同感，感觸也較深刻，這是陳與義寫作〈荔支歎〉的時空背景與特殊心境。陳氏此詩以書寫荔枝起興，轉入貢荔之害，由小見大，譏刺北宋帝王耽溺物欲，不恤民生，導致亡國。陳與義〈荔支歎〉的作意繼承蘇軾〈荔支歎〉批判昏君、佞臣之精神，一脈相承，深得蘇軾詩心。蘇詩題面是〈荔支歎〉，卻未曾譏刺、感歎宋朝貢荔之失，陳與義之作恰好可補足蘇軾這個遺憾，故彌足珍貴，值得重視。或許，陳與義〈荔支歎〉如此作法，本意就在補足蘇軾原作之不足，哇逕有別，乃刻意為之。蘇軾、蘇轍、陳與義三大文學家同題競作，各騁才情，無庸置疑，自以蘇軾為第一。蘇軾原作風豪健，波瀾壯闊，情感激憤，重批判，輕詠物，上下千年，地跨南北，引物連類，窮情盡變，議論鋒發，春秋筆削，直刺當今昏君、本朝佞臣，無所避諱，深具典範與創意；陳與義同題續作居次，詩風沉鬱，情感內斂，亡國之音哀以思，兼具詠物與諷諭，專論北宋貢荔之弊，格局較小，缺乏變化，談不上典範與創意，詩境不如蘇軾開闊，氣勢不如蘇軾奔放，細膩卻有過之；至若蘇轍之作，名兄在前，詩豪在後，詩筆平凡無奇，難逃殿尾之譏。蘇軾、蘇轍同胞兄弟，幼時玩伴，少年同學，形影不離，然二詩較看，仙凡立判，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蘇軾與蘇轍同題競作的成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一場宋人同題競作的賽事裡，蘇軾獨佔鰲頭，遙遙領先其他競技者。話說回來，蘇軾一向是宋人同題競作的冠軍，詩詞皆然，所以這種結果並不令人訝異。

¹⁵⁹ 參劉昭明撰，〈蘇軾與陳希亮交遊考〉，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宋元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3月，頁519-558。劉昭明撰，〈蘇軾〈陳公弼傳〉考論〉，見《文與哲》編輯委員會編輯，《文與哲》，第3期，2003年12月，頁267-336。

六、結論

經過本文的研究，單就「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此一主題來看，蘇軾〈荔支歎〉所呈現的譏刺典範與創意約略如下：

蘇軾謫居惠州，聽聞宋哲宗同意福建轉運使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悲憤填膺，鬱悶壅塞，無法宣洩，於是寫作〈荔支歎〉，推本溯源，從建州貢茶的創始者丁謂、續成者蔡襄著手批判。〈荔支歎〉的寫法輕史料，重批判，既呼應題面的「歎」字，也承續上幅譏刺漢唐貢荔之害，使前、後幅過渡得很自然，引物連類，因屋及烏，似斷未斷，血脈相連，精神相通，不會有離題之譏，這是蘇軾寫作〈荔支歎〉的典範與創意。

蘇軾〈荔支歎〉先書寫漢唐貢荔的血淚史，深化對漢唐帝王權貴的譏刺，抒發對基層兵卒百姓的悲憫。在提出個人祝願之後，引物連類，由古入今，因漢唐貢荔之弊而及宋朝貢茶貢花之歎，由譏刺漢唐昏君權貴轉為譏刺當今聖上、本朝名宦，這是蘇軾的創意與巧思，也是〈荔支歎〉真正的詩旨。〈荔支歎〉的題面雖是悲歎荔枝帶給人民的禍害，但蘇軾引物連類，由古轉今，透過「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兩句詩，明快地將漢唐貢荔轉為本朝貢茶，巧妙地將譏刺的對象由唐朝奸佞李林甫轉為本朝奸佞丁謂，批判他創製大龍團進貢宋太宗，是宋代貢茶買寵的始作俑者。宋人對丁謂精製、進貢大龍團有許多載記，但都是稱美其品質之精良，數量之珍稀，為帝王權貴所珍愛；宋人對丁謂人品品行普遍無好感，對其貢茶取媚卻無惡評。點名道姓，寫詩譏刺丁謂貢茶買寵，蘇軾是宋代第一人，這是〈荔支歎〉的創意。其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認同蘇軾對丁謂的譏刺，推源究始，把宋代建州貢茶帶給千萬百姓的苦難，全部歸罪給丁謂，視他為千古罪人，這雖是一個很沉重的指控，卻深得蘇軾〈荔支歎〉的詩旨，深受其影響。〈荔支歎〉自註多達四處，以註明詩，彰顯譏刺之意，開門見山，直斥其非，毫無隱飾，成為本詩一大特色，這是蘇軾刻意為之，也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從丁謂開始，詩中每個被批判的宋代佞臣，蘇軾都有註論其罪，如法官斷案，罪證明確，不容狡賴！這是蘇軾寫作〈荔支歎〉的一大創意。

繼丁謂之後，宋代名臣蔡襄是〈荔支歎〉譏刺的第二位佞臣，蘇軾認為他改良丁謂大龍團，進一步精製小龍團進貢宋仁宗，是助長丁謂惡行的幫兇，其罪行

與丁謂同，故蘇軾將兩人並列，稱之為「前丁後蔡」，語氣輕蔑，厭惡之情溢於言表。蔡襄正直敢言，頗有官聲，其形象與丁謂完全不同，正因為如此，蘇軾〈荔支歎〉譏刺蔡襄貢茶取媚，將之與丁謂並列，不久就有異說。如王鞏極尊敬蘇軾，但他不同意蘇軾〈荔支歎〉對蔡襄貢茶邀寵的譏評，他認為蔡襄之所以貢茶給宋仁宗，是為了撫慰宋仁宗沒有子嗣、未立太子的傷悲。王鞏這種說法很有「創意」，很好笑，卻欠缺說服力，無法推翻蘇軾〈荔支歎〉譏刺蔡襄貢茶取寵之說。不過，有一點倒是很重要，王鞏是撰文回應對蘇軾〈荔支歎〉的第一個讀者，可說是蘇軾〈荔支歎〉接受史的第一章，彌足珍貴。

由於蔡襄正直賢良的形象深植人心，又是蘇軾的長輩，若無明確的論述，妄加譏評必惹來非議，也無法說服人心，杜絕悠悠之口。蘇軾對此情境早有先見之明，特地以註明詩，搬出座師歐陽脩四十八年前的評論來強化、證成自己對蔡襄的譏刺，一陰一陽、一生一死，師生聯手跨越時空的界限，共同批判蔡襄進貢小龍團之不當，提高讀者的接受度。蘇軾〈荔支歎〉對蔡襄貢茶的譏刺雖前有所承，但他以註明詩，以師說證成己說，強化論述，補強詩意，達到自己譏刺蔡襄的目的，此種藝術構思頗有創意。

有趣的是，蘇軾這種創意與巧思，說好聽是承續師論，發揚師說，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但如果說難聽一點，似有利用師長、借刀殺人之嫌，歐陽脩地下有知，恐未必認同蘇軾此種創意與巧思。當年，歐陽脩對蔡襄進貢小龍團雖有所臧否，但這只是求全之言，是一時激憤之語，不影響彼此之交情，兩人仍然詩文往來不絕，互動極佳。沒想到事隔多年，蘇軾作〈荔支歎〉翻舊帳，以註明詩，以歐陽脩評論蔡襄之言強化、證成自己譏刺蔡襄之論，假借歐陽脩之手鞭笞蔡襄，將蔡襄不光彩的陳年往事形於詩篇，廣為世人所知，蘇軾這種創意與巧思，恐非歐陽脩當年評論蔡襄的本意。

明代胡儼受蘇軾〈荔支歎〉的影響，稱美宋仁宗與蔡襄君臣相得之情，推崇蔡襄之書藝與博物，卻不滿蔡襄獻茶邀寵的性行。認為蔡襄〈荔枝譜〉之寫作，同精製進貢小龍團一樣，都是出自希恩邀寵之心。胡儼所論雖未必是事實，對蔡襄也不盡公平，卻可看出蘇軾〈荔支歎〉對後世的影響大陸學者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也認為是因蘇軾〈荔支歎〉的譏刺，導致蔡襄形象受損，連帶使他的文章長期被掩沒，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蘇軾〈荔支歎〉影響千年，居然可改變世人

對蔡襄風節、文章的觀感、評價與研讀興趣，論影響力之深遠，寫作效益之宏大，〈荔支歎〉堪稱是詩中典範。

在「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之後，蘇軾〈荔支歎〉由譏刺丁謂、蔡襄爭貢新茶諂媚買寵之陳年往事，進一步譏刺時政，指斥當朝昏君、佞臣：

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

蘇軾自註：

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鬥茶，許之。

於此，蘇軾〈荔支歎〉寫作時空由宋仁宗慶曆七年直接跳到宋哲宗紹聖二年。在這四十年當中，建州團茶的製造技術有兩次突破，宋神宗元豐年間福建轉運使賈青突破了蔡襄小龍團的製造技術，進貢品質更精良的密雲龍；宋哲宗元祐年間，福建轉運使又精製出品質勝過密雲龍的建州鬥茶瑞雲龍。不過，最讓有識之士欣慰的是，宋哲宗幼年嗣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認為帝王精挑好茶來喝，並不會增添聰明才智，無補於政事，反而增加百姓的負擔，毅然下令福建路轉運使不得再精製、進貢小龍團與密雲龍；到了元祐末年，又拒絕福建轉運使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之請。始於丁謂，盛於蔡襄，歷時將近一百年的宋代建州貢茶史暫告中斷。不過，此項善政不久就毀於宋哲宗之手，貪圖物質享受的他，在親政之後，重開惡例，接受福建轉運使的佞言，讓建州進貢鬥茶瑞雲龍。蘇軾謫居惠州，聽到這項消息，悲憤填膺，滿腔怒火驅使他寫作〈荔支歎〉宣洩不滿，批判時政。於是，蘇軾〈荔支歎〉在譏刺佞臣貢茶買寵之後，詩旨終於進入最高潮，由批判宋代佞臣前仆後繼，爭相精製、進貢更新更好的團茶博取帝王的歡心，轉為批判沉迷物欲的昏君，直斥當今聖上宋哲宗驕奢縱欲，貪圖享受，只知養欲，不知養德，不知養牧兆民，不知養護社稷，位高志下，不似人君，讓人鄙視。杜牧作〈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主要是在譏刺唐玄宗與楊貴妃之窮奢極欲，然寫作之時譏刺對象早已不在人世，空有譏刺之言，實無補於當時，已無法扭轉「顛阮仆谷」、

「驚塵濺血」的悲劇，也不能彰顯作者冒犯龍顏、以詩諷諫的勇氣。北宋文網遠較唐代嚴密，蘇軾本身就是文字獄的受害者，可是他依然甘冒斧鉞，繼承杜牧作意，引物連類，層層進逼，擴大、深化譏刺的人事，將譏刺人事由漢唐貢荔擴大到本朝貢茶，將譏刺人物由漢和帝、唐玄宗、楊貴妃、李林甫等前朝帝王權貴擴大到本朝名宦丁謂、蔡襄，最後逼出主旨，譏諷時政，指斥當今聖上宋哲宗驕奢縱欲，醜陋可鄙，其膽識勇氣令人動容。蘇軾喜歡以詩譏刺政治，臧否人物，〈荔支歎〉不僅是蘇軾謫居嶺海時期政治諷諭詩的代表作，批判對象層級之高、人事之廣、力度之強在蘇詩中排名第一，而作於遠謫南荒政敵環伺自顧不暇的時空背景，更能彰顯其不畏險惡、為民喉舌、直言極諫的勇氣與膽識，這是蘇軾生命的特質，是他一生立身的準則。蘇軾一生不僅常與權相處在「敵對地位」，甚至常與當朝帝王處在「敵對地位」，如宋神宗推行新法，蘇軾卻寫作詩文譏評其缺失，釀成烏臺詩案，蘇軾因此鋃鐺入獄，被抓入御史臺關了一百三十天，死裡逃生，貶謫黃州；此際宋哲宗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蘇軾竟作〈荔支歎〉指責他驕奢縱欲。正因蘇軾一生以名節自持，抗節不附，一肚皮不合時宜，所以屢遭貶謫，初貶黃州，再貶惠州，三貶儋州，顛沛流離，備嘗艱辛。然而，也因為這種不佞帝王、不懼權貴、不畏罪罟的風骨與勇氣，使蘇軾〈荔支歎〉衝出杜牧的藩籬。在政治上，蘇軾或許是失敗了，但若論文學表現與人格示範卻非常成功，〈荔支歎〉是宋代政治諷諭詩的典範，蘇軾之危言危行、獨立不回更是詩人的典範。

蘇軾謫居惠州，見宋哲宗意氣用事，銳行紹述，執意反對高太后元祐善政，恢復進貢建州鬥茶瑞雲龍，驕奢縱欲，賢人遠謫，奸佞滿朝，國政日下，百感交集，鬱悶壅塞，無法宣洩，將滿腔悲憤化為〈荔支歎〉，引物連類，由古轉今，健筆如刀，直刺當朝昏君、滿朝佞臣，這就是〈荔支歎〉之所以爆發強大震撼力的原因。〈荔支歎〉「奇橫」的詩風與蘇軾「鬱勃」的心境完全貼合，詩的批判力有多強烈，代表蘇軾的內心有多悲憤。正因為蘇軾內心太悲憤，連指斥乘輿也無法完全宣洩，而建州貢茶之譏已達極限，無法再渲染著墨，盡吐心中塊磊；於是蘇軾詩筆一轉，再度運用引物連類的巧思，將建州貢茶之譏推進到洛陽貢花之譏，其事雖異，其情實同，皆源於媚上邀寵之思，錢惟演的陋行與丁謂、蔡襄、「閩中監司」沒有兩樣，所以蘇軾將內心宣洩未盡的悲憤全都傾注在錢惟演身上，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蘇軾自註：「洛陽貢花，自

錢惟演始。」蘇軾〈荔支歎〉結尾盪開詩筆，以批判錢惟演貢花買寵收結，然詩中所流露譏刺之音卻嫋嫋不絕。這種情境，就像火山第二次爆發，務必將內部熾熱岩漿盡數噴出；就像主地震之後的餘震，務必將地底累積的能量全部釋出，否則地殼將無法承受。〈荔支歎〉詩尾對錢惟演的譏刺，正是蘇軾刻意製造出來的火山再爆炸與主地震之後的餘震，使宋王朝大地上的佞臣、昏君再度受到衝擊、震撼，〈荔支歎〉譏刺佞臣昏君的作意因此得以無限開拓、延伸：「不僅貢茶的佞臣可惡可鄙，貢花的佞臣一樣可惡可鄙，全天下貢物媚上的佞臣都可惡可鄙，而驕奢縱欲的統治者最可惡最可恨！」〈荔支歎〉之寫作距今 912 年，可是蘇軾罵盡天下昏君、佞臣的聲吻卻如在眼前，餘音嫋嫋，久久不散。讀蘇軾〈荔支歎〉，不僅古代昏君佞臣該感到羞愧，當今那些收送貴重珠寶與××禮券的紅頂商人、政客權貴、皇親國戚，也該感到無地自容。放諸四海，千古常新，垂教後世，這就是蘇軾〈荔支歎〉思想意涵的最高成就與終極典範。（本文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部份成果，計畫編號：NSC 93-2411-H-110-011，謹此誌謝）

主要參考書目

(依引用順序排列)

-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2刷。
- 《樊川詩集注》，唐·杜牧撰，清·馮集梧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9月，初版。
- 《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清·趙克宜撰，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
-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
- 《蘇文忠公詩集》，清·紀昀評點，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載版次。
-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1版2刷。
-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戴均良等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7月，1版1刷。
- 《中國茶典》，《中國茶典》編委會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
- 《東都事略》，宋·王稱撰，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2月，未載版次。
- 《宋史》，元·脫脫等撰，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
- 《李觀集》，宋·李觀撰，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10月，初版。
- 《隆平集》，宋·曾鞏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37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初版。
- 《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李之亮撰，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6月，1版1刷。
- 《丁謂詩》，宋·丁謂撰，《全宋詩》本（冊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1版1刷。
- 《新校夢溪筆談》，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4月，香港重印版。

- 《丁謂文》，宋·丁謂撰，《全宋文》本（冊 5），成都：巴蜀書社，1989 年 10 月，1 版 1 刷。
- 《宣和北苑貢茶錄》，宋·熊蕃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8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2 月，初版。
- 《舊唐書》，後晉·劉昫撰，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2 月，1 版 7 刷。
- 《能改齋漫錄》，宋·吳曾撰，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5 月，初版。
- 《演繁露續集》，宋·程大昌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8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2 月，初版。
- 《畫墁錄》，宋·張舜民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
- 《澠水燕談錄》，宋·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1 刷，與宋·歐陽脩《歸田錄》合刊本。
- 《楊文公談苑》，宋·楊億口述，宋·黃鑑筆錄，宋·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8 月，1 版 1 刷，與宋·張師正《倦遊雜錄》合刊本。
- 《獨醒雜誌》，宋·曾敏行撰，《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1 版 1 刷。
-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周本淳重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年 11 月，1 版 2 刷。
- 《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清·王先謙校，台北：廣文書局，1979 年 4 月，再版。
-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1 版 2 刷。
- 《蔡襄全集》，宋·蔡襄撰，陳慶元、歐明俊、陳貽庭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 月，1 版 1 刷。
- 《歐陽脩全集》，宋·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3 月，1 版 1 刷。
- 《高齋漫錄》，宋·曾慥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

- 《元豐九域志》，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2月，1版1刷。
- 《甲申聞見二錄補遺》，宋·王鞏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
- 《淮海集箋注》，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1刷。
-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2版1刷。
- 《塵史》，宋·王得臣撰，俞宗憲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宋·梅堯臣撰，朱東潤校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4月，初版。
- 《珊瑚網》，明·汪珂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1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
- 《頤庵文選》，明·胡儼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2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2月，初版。
- 《蔡襄集》，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
- 《石林燕語》，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清波雜誌校注》，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9月，1版1刷。
- 《黃庭堅全集》，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1版1刷。
- 《欒城集》，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

- 《蘇軾詞編年校注》，宋·蘇軾撰，鄒同慶、王宗堂編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1版1刷。
- 《傅幹注坡詞》，宋·傅幹注，劉尚榮校證，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7月，1版1刷。
- 《詞品》，明·楊慎撰，《詞話叢編》本（冊1），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2月，台1版。
- 《分甘餘話》，清·王士禎撰，張世林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1版3刷。
- 《宋元學案》，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7月，1版2刷。
-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宋·李廌撰，台北：藝文印書館，未載出版年月與版次。
- 《隨手雜錄》，宋·王鞏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
- 《張舜民文》，宋·張舜民撰，《全宋文》本（冊41），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10月，1版1刷。
- 《中國名茶志》，王鎮恒、王廣智主編，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1刷。
- 《范仲淹詩》，宋·范仲淹撰，《全宋詩》本（冊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1版1刷。
- 《品茶要錄》，宋·黃儒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
- 《碧溪詩話》，宋·黃徹撰，《歷代詩話續編》本（冊上），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
- 《袁高詩》，唐·袁高撰，《全唐詩》本（冊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12月，未載版次。
- 《山谷詩內外集註》，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溫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 〈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劉昭明撰，《文與哲》，第7期，2005年12月。

- 《梁谿漫志》，宋·費袞撰，金圓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宋·費袞《梁谿漫志》「東坡謫居中勇于為義」考論〉，劉昭明撰，《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
- 《論語注疏》，魏·何晏等撰，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本（冊8），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10月，4版。
- 《宋刑統》，宋·竇儀等撰，薛梅卿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1版1刷。
- 《東坡烏臺詩案》，宋·朋九萬編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
- 《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清·趙克宜撰，台北：新興書局，1967年9月，新1版。
- 《蘇軾研究》，王水照，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1版1刷。
- 《邵氏聞見錄》，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2刷。
- 《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1版2刷。
- 《宋兩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李之亮撰，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6月，1版1刷。
- 《墨莊漫錄》，宋·張邦基撰，丁如明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冊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蘇詩選評》，清·汪師韓撰，《蘇軾資料彙編·詩評》輯錄本（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1版1刷。
- 《樹經堂詩初集》，清·謝啟昆撰，《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1版1刷。
-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
- 《初白庵詩評》，清·查慎行撰，《蘇軾資料彙編·詩評》輯錄本（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1版1刷。
- 《昭昧詹言》，方東樹撰，汪紹楹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6月，1版3刷。

《廣群芳譜》，清·康熙敕編，清·汪灝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6月，1版1刷。

《陳與義集》，宋·陳與義撰，白敦仁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未載出版年月與版次。

〈蘇軾與陳希亮交遊考〉，劉昭明撰，《宋元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3月，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蘇軾〈陳公弼傳〉考論〉，劉昭明撰，《文與哲》，第3期，2003年12月。

The Sarcasm, paradigm, and Creation of the “Sigh of the Lichee” of Su Shih

Liu, Chao-Ming*

[Abstract]

Su Shih's “Sigh of the Lichee” is the most famous poem of his Hui-chou period. The idea derived from Tu Fu and Su exhausted the possibilities by chang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lichee to that of tea and flower. He slyly changed his target of sarcasm from the corrupted emperors and minister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corrupted ones of his era. He even pointed out their names without camouflage. By so doing, he earned sincere praise from later generations.

The artistic skills and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Sigh of Lichee” went beyond the same kind of poetry by the Tang and Sung writers and establishe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genr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nature of my study, this paper only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blaming the corrupted. I will examine the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n prove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events by lay out the related poems.

It is my hope that this paper will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rticular poem and throw some light on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Su Shih (蘇軾), Ou-yang Hsiu (歐陽脩), Ting Wei (丁謂), Ts'ai Hsiang (蔡襄), Chien Wei-yian (錢惟演), The Emperor Ch'ing of Sung (宋哲宗), Lichee, Te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